新史學二十九卷二期
二〇一八年　六月

中國隋唐五代時期的檳榔文化

林富士*

檳榔進入中國版圖大約在西漢武帝時期(140-87 B.C.)，但一直到東漢、三國時期(西元第一至第三世紀)才逐漸進入中國的知識領域，而且，一直到六朝時期(西元第三至第六世紀)，嚼食或利用檳榔的風尚基本上只流行於南方的上層階級。其後，中國結束了南北分裂的格局，政治中心再度回歸北方。因此，檳榔的流傳是否因中國的統一而得以跨越南方的境域，便成為本文探索的核心問題。本文認為，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境內生產或流通檳榔的地區，主要在嶺南、雲南、福建、江蘇、浙江、湖南、長安、洛陽和敦煌。有嚼食風尚的地區，只有嶺南、雲南和福建，其他地區則是以檳榔為藥物。但是，若不從實物來看，檳榔在這個時期的文化版圖上所留下的漬痕，應該比前朝還要深廣。當時人對於檳榔名物的認知，已經相當清晰。在承繼與集成前人知識之外，對於檳榔的醫藥功能有更新的認識，也有更多樣的臨床運用；對於檳榔文化在域外的分布，有更多的了解，更親近的接觸；對於檳榔的文學書寫，有更多樣的表現，更新的意象營造。以檳榔文本的作者或主角而言，他們大多數都是北人，只有少數算是南人。因此，當時檳榔在中國社會擴散的範圍，應該已經超過前朝。

關鍵詞：**隋唐**、**五代**、**檳榔**、**醫藥**、**文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一、前言

中國並非檳榔的原鄉。綜合植物學(botany)、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生物考古學(bioarchaeology)、考古學、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歷史文獻和民族誌的材料來看，檳榔的原生地和檳榔文化的發源地，應該是在馬來西亞半島和印尼群島一帶，然後向東傳布到太平洋群島，向西傳布到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區，接著，再由南亞、東南亞向外擴散。[1]

檳榔進入中國政治版圖大約是在西漢武帝時期(140-87 B.C.)，但相關的紀載非常罕見，一直到東漢、三國時期(西元第一至第三世紀)才逐漸進入中國的知識領域，無論是物種、物名的討論與描述，還是食用禮俗、藥用功效的敘述，都已見諸文獻紀錄。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元第三至第六世紀)，透過朝貢及貿易，東南亞及南洋一帶的檳榔才不斷進入中國本土，不少南方的統治階層開始流行嚼食檳榔，不過，檳榔在這時期仍被視為外來的奇珍異物，也罕見於北方。然而，當時的知識階層和醫家對於檳榔的認知又更加深入，舉凡其主要產地、生物特性、食用方法、藥物功能、社會功能，都有不少論述，而文學方面的歌詠、書寫也不罕見，只是作者大多是所謂的「南人」。基本上，當時的檳

1 參見 Thomas J. Zumbroich,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Betel Chewing: A Synthesis of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87-140. 按：本文所說的「檳榔文化」，是指人對於檳榔(物自身)的認知、使用及態度，以及檳榔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涵。而檳榔主要作為食用和藥用之物，食用方式大多是咀嚼由檳榔子、荖葉及其他香料組成的「檳榔嚼塊」，藥用可採單方或複方，亦即可以單獨使用檳榔子或是結合其他藥物治療各種疾病。但是，嚼食檳榔通常也被認為具有防治疾病的功效，因此，本文並不特別強調兩者的區分。

榔文化主要流行於南方。[2]

其後，隋文帝(581-604 在位)於開皇九年(589)滅陳，結束中國長達三百餘年的南北分裂格局，政治中心再度回歸北方，接續的唐帝國也是以關中為基地。因此，檳榔在中國的流傳是否因帝國的統一而得以跨越南方的境域，便頗值得注意。但過去的研究者對於這個時期的檳榔很少著墨，以研究這個課題的先驅者容媛(1899-1996)來說，他只在「結論」的地方簡略提到，唐代廣州人雖然嗜食檳榔，但還不及安南人那麼「利害」。[3]另一位學者任乃強(1894-1989)則大膽論斷，檳榔「到了隋唐時期便普及全國」，卻未提出充分的證據。[4]此外，郭聲波、劉興亮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探索檳榔文化，運用相當多元的資料，對於中國近代檳榔種植與檳榔習俗的空間分布，做了相當仔細的分析，但是，對於近代以前的情形，他們只說「最晚到晉代，嶺南地區已開始嚼食檳榔」，但「快速傳播當在宋代」，地區包括嶺南、福建泉州、廣南西路、雲南等地，對於隋唐五代時期(西元第六至十世紀)的情形，略而不談。[5]其他談中國檳榔源流、習俗的論著，基本上也較忽略檳榔文化在這段期間的發展。[6]唯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在討論唐代中國

2 參見容媛，〈檳榔的歷史〉，頁 1-51；林富士，〈檳榔入華考〉，頁 94-100；王冠中，〈魏晉南北朝外來文化輸入及其對時人生活的影響〉；Christian A. Anderson, “Betel Nut Chewing Culture: The Social and Symbolic Life of an Indigenous Commodity in Taiwan and Hainan.”

3 詳見容媛，〈檳榔的歷史〉，頁 1-51。

4 詳見常璩，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頁 317-318，任乃強校注文。

5 詳見郭聲波、劉興亮，〈中國檳榔種植與檳榔習俗文化的歷史地理探索〉，頁 5-15。

6 例如：Camille Imbault-Huart, “Le Bétel,” 311-328; 林明華，〈我國栽種檳榔非自明代始——對《中越關係史簡編》一則史實的訂正〉，頁 99-102；葛應欽，〈嚼食檳榔的文化源流〉，頁 32-34；王四達，〈閩台檳榔禮俗

南方及其周邊的瘴氣、植物和飲食習慣時，對於當時檳榔的產地、醫藥和社會功能有些介紹，但也相當簡略。[7]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二、知識的集結與擴充——類書與醫藥

事實上，從隋唐到五代時期，檳榔在中國社會的流傳有了微妙的變化。首先，在唐高祖(618-626在位)武德七年(624)成書的《藝文類聚》，在「菓部」之下便有專門的檳榔條目，收錄了漢至六朝各種以檳榔為母題的詩文。[8]《藝文類聚》是唐初由高祖下令編纂的官修類書，主編是歐陽詢(557-641)，其餘主要編者包括：令狐德棻(583-666)、裴矩(547-627)、趙弘智(572-653)、陳叔達(573?-635)、袁朗(563-627?)等，都是唐初知識界的菁英，包括了南朝與北朝的遺老。[9]他們多數是「北人」，[10]但是，主

源流略考〉，頁53-58；陳良秋、萬玲，〈我國引種檳榔時間及其他〉，頁48-50；周明儀，〈從文化觀點看檳榔之今昔〉，頁111-137；曹興興、茹慧，〈中國古代檳榔的栽培技術及歷史地域分布研究〉，頁193-197。

7 詳見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141-142, 151; Edward H.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32, 72, 133, 174-175.

8 除了「菓部」之外，《藝文類聚》在「居處部」、「雜器物部」中也都收有涉及檳榔的詩文。詳見歐陽詢等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61，〈居處部・總載居處〉，頁1107；卷73，〈雜器物部・盤〉，頁1256；卷87，〈菓部・檳榔〉，頁1495-1496；卷87，〈菓部・瓜〉，頁1505。

9 詳見韓建立，《《藝文類聚》纂修考論》；韓建立，〈《藝文類聚》編撰人員考辨〉，頁96-101。

10 令狐德棻為宜州華原(今陝西銅川市耀州區)人，裴矩為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趙弘智為洛州新安(今河南新安縣)人。詳見劉昫等，《舊唐書》，卷63，〈裴矩傳〉，頁2406；卷73，〈令狐德棻傳〉，頁2596；卷188，〈孝友列傳・趙弘智〉，頁4921。

編歐陽詢是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11]袁朗和陳叔達都是南朝人，陳亡才北遷。[12]因此，這一次「檳榔文本」的首度集結，也可以說是南方檳榔文化的向北擴散。

除了這種官修的集體性編輯之外，若干個人撰述中也有前代知識的彙整與分類，其中不乏有關檳榔的文本。例如，東牟(今山東煙臺市牟平縣)人段公路(活躍於 869-871)在嶺南任官時，曾經針對當地特有的風土物產、民情禮俗，親自探訪、採集「田野」資料，撰成《北戶錄》，但書中其實也收錄不少前人說法或前朝故事。[13]以檳榔來說，他在說明檳榔計數單位時說「檳榔為口」，便引述南朝沈約(441-513)受皇帝賞賜「交州檳榔千口」、陸倕(470-526)「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的典故；[14]在說明檳榔名物之時，引述周成(三國魏人)《雜字》說：「檳榔，果也。

11 詳見歐陽修，《新唐書》，卷 198，〈歐陽詢傳〉，頁 5645-5646。

12 根據《舊唐書》的說法，袁朗是雍州長安(今陝西西安)人，但是，其父袁樞(517-567)為南朝重臣，袁朗出生於袁樞在京師建康任官期間，因此，其出生地應該就在建康(今南京)，或是其父祖家族寓居的吳郡(治所在今江蘇蘇州)。而陳叔達是南朝陳宣帝(569-582 在位)的皇子，長城(今浙江省長興縣)人。他們都是在陳朝被滅之後才北遷長安。因此，都可以算是「南人」。詳見姚思廉，《陳書》，卷 17，〈袁樞傳〉，頁 240-241；劉昫等，《舊唐書》，卷 61，〈陳叔達傳〉，頁 2363；卷 190，〈文苑列傳．袁朗〉，頁 4984；歐陽修，《新唐書》，卷 100，〈陳叔達傳〉，頁 3925-3926。按：兩唐書都未載明陳叔達的籍貫或出生地，但是，陳叔達三位兄弟(陳叔榮、陳叔明、陳叔興)的墓誌都說其出身為「吳興長城」，因此，陳叔達應該可以斷定為長城人。詳見〈陳叔榮墓誌〉、〈陳叔明墓誌〉，收入韓理洲輯校，《全隋文補遺》，頁 289-290、322-323；〈陳叔興誌〉，收入王其禕、周曉薇編著，《隋代墓誌銘彙考》，頁 239。按：有關袁朗的身世及陳叔達的籍貫與根據，承蒙《新史學》匿名之編輯委員賜告，特此致謝。

13 詳見侯先棟，〈段公路《北戶錄》研究〉。按：段公路的籍貫和出生地不詳，但學者大多認為他是段成式(803?-863)之子，故從其父，暫定為東牟人。

14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2，〈米蒸〉，頁 12b。

似螺可食。」[15]他所添加的新知識則有當地食用檳榔的方法：

> 今瓊、崖、高、潘州，以糖煮嫩大腹檳榔，辯州以蜜漬益智子，食之亦甚美。[16]

這是將檳榔做成蜜餞的方式。其次，他在提及當地的一些植物時，也會拿來和檳榔做比較，如「桄榔，莖葉與波斯棗、古散、椰子、檳榔小異」、[17]「山胡桃，皮厚，底平，狀如檳榔。」[18]此外，他還注意到外國船上有一種特殊的鼓以檳榔為名：

> 蕃船上多以象皮鞔鼓，鼓長而頭尖，狀如棗核，謂之檳榔鼓。[19]

《北戶錄》看似博物志、風土志之類的著作，但這種既引述古籍、前人之說，又補以一己見聞的做法，也是唐人集結新知與舊說的手法。

在醫學領域也是如此。當時人對於前朝所積累的知識有所承繼，也有所發揮。[20]在本草方面，包括：甄權(541-643)《藥性論》、[21]蘇敬(蘇恭，599-674)《新修本草》(詳下文)、孟詵(約為 621-713)《食療本草》(詳下文)、李珣(756-779?)《海藥本草》，[22]以及五代時期(907-979)的日華子《日華子

15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2，〈食目〉，頁 16b。關於中國「雜字」的傳統，詳見李國慶，〈雜字研究〉，頁 61-66。

16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2，〈食目〉，頁 16b。

17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2，〈桄榔炙〉，頁 9b。

18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3，〈山胡桃〉，頁 4b。

19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1，〈蚺蛇牙〉，頁 10a。

20 詳見山田慶兒，《中国医学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頁 183-206。

21 甄權，《藥性論》，卷 2，〈草木類．白檳榔〉，頁 77。按：甄權為許州扶溝(今河南扶溝縣)人；詳見劉昫等，《舊唐書》，卷 191，〈方伎列傳．甄權〉，頁 5089。

22 李珣，《海藥本草》，頁 41。案：李珣是波斯後裔，應該生長於蜀地，或說是梓州(今四川三台縣)人，後曾居住於廣州，以文學、本草學留名。詳見蒲曾亮，〈李珣生平及其詞研究〉；陳明，《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頁 121-151。

本草》、後蜀韓保昇的《蜀本草》(約成於 935-960 間)、後唐天成年間(926-930)的侯寧極(926-930 之間的進士)《藥譜》等書，都著錄了檳榔，並針對其藥性、藥效多所論述(詳下文)。

這個時期醫家的檳榔知識雖然大多承襲隋唐之前的舊作，但也有所發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唐高宗(649-683 在位)顯慶四年(659)完成的官修《新修本草》(《唐本草》)。[23]此書載云：

> 檳榔，味辛溫，無毒，主消穀、逐水、除[痰](淡)澼、殺三蟲、去伏尸、療寸白，生南海。
>
> 此有三、四種，出交州形小而味甘，廣州以南者，形大而味澀，核亦大。尤大者，名猪(豬)檳榔，作藥皆用之。又小者，南人名蒟子，俗人呼為檳榔孫，亦可食。
>
> 謹案：檳榔生者極大，停數日便爛，今人北來者，皆先灰汁煮熟，仍火薰使干(乾)，始堪停久。其中人(仁)，主腹脹，生擣末服，利水穀。傅瘡，生肌肉，止痛。憢(燒)為灰，主口吻、白瘡。生交州、愛州及崑崙。[24]

上引文字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論檳榔的藥性、藥效及產地，只是承襲陶弘景(456-536)《名醫別錄》的舊文。第二段論檳榔的名物和品類，基本上是綜合六朝以來各家的說法，進行分疏、條理而成，雖有舊說，但也有一家之言。第三段則是根據唐人的經驗提出的新說，闡述檳榔不易保存的物性及北運遠輸時的薰乾法，並增補了檳榔仁、檳榔子的藥效

23 關於《新修本草》的編纂過程、內容、版本及其重要性，詳見岩本篤志，《唐代の医薬書と敦煌文献》，頁 94-168。

24 蘇敬，《新修本草》，卷 13，〈木．檳榔〉，頁 646。按：蘇敬籍貫不詳，但從一些零星的記載推斷，他早年應該長期居住在江南或嶺南一帶；詳見王家葵、張瑞賢、銀海，〈《新修本草》纂修人員考〉，頁 200-204。

及使用方式，同時說明當時檳榔的主要產地在交州、愛州及崑崙。[25]

這本書的檳榔論述影響很大，後續的本草著作大多直接引述或以此為基礎而略作增刪，例如，後蜀韓保昇(活躍於 934-965)主導的官修《蜀本草》所載的「檳榔」便與此基本相同，只是文字小有差異，並加入：「檳榔，溫，消宿食」之語。[26]然而，《日華子本草》卻說：

> 檳榔，味澀。除一切風，下一切氣，通關節、利九竅、補五勞七傷，健脾調中，除煩，破癥結，下五膈氣。[27]

這對於檳榔的藥性和功效的論述顯然和《新修本草》及唐前的本草書的說法有不小的差異，雖然仍強調檳榔的「排除」、「疏通」的功能，但也另外提出「補五勞七傷」、「健脾調中」、「除煩」的說法，這似乎是根據唐代臨床醫學的實踐而得的經驗之談(詳下文)。

此外，孟詵《食療本草》(《補養方》)則說：

> 檳榔，多食發熱，南人生食。閩中名檳欖子。所來北者，煮熟，熏乾將來。[28]

---

25 關於唐代藥物的產地和交易情形，詳見于賡哲，〈唐代藥材產地與市場〉，頁 75-104。按：此文認為《新修本草》所述之藥物產地基本上都是根據《千金翼方》，故未納入史料分析。但以檳榔來說，《新修本草》所載的產地便比《千金翼方》來得詳細。

26 韓保昇，《蜀本草》，卷 13，〈木部中品．檳榔〉，頁 432。按：韓保昇為潞州長子(今山西長治市長子縣)人；詳見吳任臣編，《十國春秋》，卷 56，〈韓保昇傳〉，頁 7b。

27 日華子，《日華子本草》，卷 12，〈木部中品．檳榔〉，頁 129。按：日華子為四明(今浙江寧波市鄞州區)人；詳見岡西為人編著，《宋以前醫籍考》，〈日華子諸家草本〉，頁 1313。

28 詳見孟詵，《食療本草》，頁 23。按：《食療本草》已經散佚，本文所採用的是謝海州等人所輯校的版本。此外，近代在敦煌所發現的寫本「本草」殘卷(S.76)，學界大都認為即孟詵《食療本草》之古本；詳見范鳳源訂正，《敦煌石室古本草》；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食療本草殘卷〉，頁 673-686；袁仁智、潘文主編，《敦煌醫藥文獻真迹釋錄》，頁 223-231。

這裡主要是強調嚼食檳榔的感官經驗為「發熱」，以及南方人吃生檳榔的食用方式，而運輸到北方的檳榔則會先煮熟、燻乾。

更重要的是，檳榔此時已廣泛運用於臨床醫療方面，以孫思邈(581?-682)《千金要方》來說，他對於檳榔的藥性和功效有以下描述：

> 味辛溫澹，無毒。消穀、逐水，逐淡澼，殺三蟲，去伏尸，治寸白。[29]

這基本上是承襲南朝陶弘景的舊說。[30]但是，全書使用檳榔的醫方多達 18 種，所對治的疾病包括：婦人求子(1 首)、口病(口臭、身臭)(1 首)、風痱(1 首)、肝病(1 首)、胸痺(心臟)(2 首)、脾寒(1 首)、反胃(1 首)、積氣(肺臟)(4 首)、痰飲(大腸腑)(2 首)、九蟲(寸白蟲；大腸腑)(1 首)、補腎(1 首)、霍亂(膀胱腑)(1 首)、解毒(解五石毒)(1 首)。[31]而其《千金翼方》也有 7 種檳榔方，大部分和《千金要方》大同小異，唯增加專治水腫的「檳榔圓」。[32]這些運用所對治的疾病，就五臟六腑來說，有肝、心、脾、肺、腎五臟；胃、大腸、膀胱三腑。而「求子」、「補腎」都與房中有關，芳香和解毒的作用則是首度出現。

其後，王燾(670-755)《外臺秘要》更進一步收錄了 111 首含有檳榔的醫方，其所對治的疾病包括：一、瘧病(山瘴瘧)(1 首)；二、嘔吐(噫醋)(4

29 詳見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 26，〈食治．果實〉，頁 465b。按：孫思邈為京兆華原(今陝西銅川市耀州區)人；詳見劉昫等，《舊唐書》，卷 191，〈方伎列傳．孫思邈〉，頁 5094。

30 詳見陶弘景，《名醫別錄》，卷 2，〈中品．檳榔〉，頁 145。

31 詳見附錄 1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檳榔方」。

32 詳見孫思邈，《千金翼方》，卷 5，〈婦人一．婦人求子．慶雲散〉，頁 61a；卷 5，〈婦人一．熏衣浥衣香方．五香圓〉，頁 69a；卷 5，〈婦人一．熏衣浥衣香方．十香圓〉，頁 69a；卷 15，〈補益．解散發動方〉，頁 171a-172b；卷 18，〈雜病上．胸中熱方〉，頁 208b；卷 19，〈雜病中．水腫方．檳榔圓〉，頁 219b；卷 19，〈雜病中．飲食不消方〉，頁 226a-226b。

首)；三、心腹痛(包括心痛、腹痛、腹脹)(23 首)；四、痰飲(4 首)；五、欬嗽(肺脹、肺氣積聚、上氣)(6 首)；六、痃癖(12 首)；七、鬼疰(伏連、遁尸)(2 首)；八、諸風(中風、風驚恐、頭風旋)(6 則)；九、虛勞(肝勞、脾勞、腰胯痛、腰腳疼痛、腰腎膿水)(6 首)；十、腳氣(27 首)；十一、水腫(2 首)；十二、癭病(1 首)；十三、腋臭(1 首)；十四、疝氣(2 首)；十五、蟲病(九蟲、五藏蟲、蛔蟲、寸白蟲)(7 首)；十六、金瘡(包括火燒瘡)(1 首)；十七、諸毒(3 首)；十八、小兒諸疾(包括：痃癖、羸瘦、肺脹氣急)(3 首)。[33]其中，基本上用來「解毒」的〈仙人絳雪方〉則號稱能「療一切病」，包括大小便不通、煩悶不安、婦人產後諸病、墮胎、孩子驚癇、酒醉、久痢、天行時氣、一切熱病等。[34]

從這些檳榔方來看，治療腳氣(27 首)和心腹痛(23 首)佔最大多數，專治小兒疾病的醫方也已出現。另外，傅瘡、癭病、鬼疰、瘴癘的治療功效似乎都是首度被提及。[35]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共收錄了 19

33 詳見附錄 2 王燾《外臺秘要》「檳榔方」。按：王燾的籍貫說法不一，大多認為是郿縣(今陝西寶雞市郿縣)，但也有人認為是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本文認為萬年之說比較可信。相關的討論，詳見萬方、陶敏，〈王燾家世里籍生平新考〉，頁 40-44；李平，〈唐代醫家王燾考〉，頁 181-184；陳穎、洪營東，〈王燾《外臺秘要方》探源〉，頁 24-25。

34 詳見王燾，《外臺秘要》，卷 31，〈採藥時節所出土地諸家丸散酒煎解諸毒等〉，頁 849。

35 這些檳榔方引述的醫藥文獻有：《廣濟方》、《延年方》、《必效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古今錄驗方》(唐代甄立言；545-627?)、《集驗方》、《救急方》、《許仁則方》(唐代許仁則)、《張文仲方》(唐代張文仲；約 650-710)、《刪繁方》、《蘇長史方(腳氣方)》、《備急方》、《吳昇方》、《崔氏方(腳氣方)》、《唐侍中方(腳氣方)》、《蘇恭方(腳氣方)》(唐代蘇恭 / 蘇敬；約 599-674)、《范汪方(水腫方)》(東晉范汪)、《療癭司農揚丞服效方》、《近效方》、《劉氏方(小兒方)》，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是當時人流傳的經驗方。由此可知，《外臺秘要》中檳榔方雖然有些來自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古方，但唐初以來新增的經驗方似乎佔大多數；詳見附錄 2 王燾《外臺秘要》「檳榔方」。

首「山瘴瘧方」，雖然只有一首使用了檳榔，但文中提到：

> 凡跋涉江山、防諸瘴癘及蠱毒等，常服木香犀角丸方。[36]

而這段文字及藥方雖然未明確說明來源，但卻緊連著「療瘧瘴」的「孟補闕嶺南將來極效常山丸方」而來，[37]因此，可能都是來自嶺南的經驗方。事實上，劉恂(873?-921?)《嶺表錄異》也說：

> 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婁藤兼之瓦屋子灰，兢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啗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38]

劉恂是酆陽(今江西酆陽)人，在唐昭宗時期(889-904)曾任廣州司馬，其後長居南海，[39]因此，這應該是他的親身見聞。由此可見，最晚從唐代中晚期開始，吃檳榔可以防治南方的「瘴癘」已經開始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而唐末五代初的侯寧極更在他的《藥譜》中給予檳榔「洗瘴丹」名稱，[40]其後，從北宋初年一直到元、明時期諸多的筆記、詩文、藥典，都以此做為檳榔專用的別名。[41]由此看來，檳榔大概從唐中葉開始逐漸與防治瘴癘、瘟疫產生緊密的關係。[42]

至於使用檳榔治病的具體案例，當時文獻也有所記載。例如，《外臺秘要》在收錄治療「氣滿腹脹不調、不消食」的「青木香丸」方時，

---

36 王燾，《外臺秘要》，卷 5，〈瘧病〉，頁 159b-160a。

37 王燾，《外臺秘要》，卷 5，〈瘧病〉，頁 159b。

38 詳見劉恂，《嶺表錄異》，〈檳榔〉，頁 197。

39 詳見商璧、潘博校補，《嶺表錄異校補》，〈序論〉，頁 1-17。

40 侯寧極，《藥譜》，收入陶穀，《清異錄》，卷 2，〈藥〉，頁 24b；王棠，《燕在閣知新錄》，卷 29，〈用藥〉，頁 37a。

41 詳見蘇軾撰，施元之註，《施註蘇詩》，卷 40，〈食檳榔〉，頁 13a，注文；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16，〈藥譜〉，頁 200；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31，〈果部．夷果類．檳榔〉，頁 1829。

42 詳見林富士，〈瘟疫、社會恐慌與藥物流行〉，頁 5-12。

王燾特別註明:「韓同識頻服,大效,古今常用」。[43]而柳宗元(773-819)則敘述了自己的切身經驗。他在唐憲宗(805-820 在位)元和四年(809)寫給友人李建(?-822)的信中提到:

>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閒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喜。[44]

這是柳氏被貶謫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市)時的治病、用藥經驗談。[45]當時他因罹患「痞疾」(胸腹脹滿),採用南方人的方法,用檳榔、餘甘治療,雖有好轉,但可能因為用藥過量,也產生了後遺症。事實上,在謫放期間,柳宗元健康情形相當不好,他除了服用「南人」的藥方之外,還植栽了不少藥用植物。[46]

除了用來醫治人的疾病之外,當時人已注意到檳榔也可以治療牲畜的疾病。例如,題名為唐代李石(?-845)所撰的《司牧安驥集》便說:

> 識得尋常病,便須用桔皮,檳榔為第一,蔥酒最相宜。[47]

---

43 王燾,《外臺秘要》,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1。

44 詳見柳宗元,《柳宗元集》,卷 30,〈與李翰林建書〉,頁 2008-2017。

45 柳宗元為河東郡(今山西永濟市)人,但長居長安,年輕時因其父親柳鎮至兩湖、江西一帶任官,而得以隨從遊歷四方。21 歲中進士第,很早就躋身權貴行列,但唐憲宗即位之後(805),他隨即被貶放南方,光是在永州就長達 10 年(805-815)。關於柳宗元的生平及在「永州司馬」任內的文學創作,詳見羅聯添編,《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松本肇,《柳宗元研究》,頁 5-20;下定雅弘,《柳宗元——逆境を生きぬいた美しき魂》;翟滿桂,《柳宗元永州事迹與詩文考論》。

46 詳見松本肇,《柳宗元研究》,頁 140-176;下定雅弘,《柳宗元》,頁 101-119。

47 李石,《司牧安驥集》,卷 1,〈王良百一歌・起臥〉,頁 41。

又說：

> 大小腸中冷氣迎，皆因厥逆病相乘。起卧痛時頻輒顫，腸中作聲似雷鳴。便用止痛檳榔散，何愁此病不安寧。[48]

此書的真實作者或許不是李石，但此書問世之後，便成宋、元、明時期的獸醫(主要是馬醫)必讀教材，可見其重要性。[49]無論如何，據此可以知道，唐代獸醫已相當重視檳榔的使用。

三、域外見聞的增廣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對於域外檳榔文化的認知，見於文獻記載的，主要仰賴來華的外國使節和佛教僧侶，而所提及的地點只有林邑國(位於現在的越南中、南部一帶)、[50]扶南(在今柬埔寨境內)、[51]干陁利國(在印尼蘇門答臘的巨港)。[52]但在隋唐五代時期，中國社會與南洋、南亞地區的往來日益頻繁，對於域外的見聞也增廣不少。

以檳榔文化來說，這個時期的文獻所提到的地點和地理範圍便大

48 李石，《司牧安驥集》，卷 5，〈黃帝八十一問并序．三十四問〉，頁 191。

49 參見鄒介正，〈《司牧安驥集》的學術成就和影響〉，頁 116-119。按：李石為李唐宗室，郡望隴西(今甘肅臨洮縣)；詳見劉昫等，《舊唐書》，卷 172，〈李石傳〉，頁 4483。

50 詳見蕭子顯，《南齊書》，卷 58，〈列傳．南夷．扶南國〉，頁 1015-1017。關於扶南國的地域範圍，參見陳佳榮，《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頁 54-55。

51 詳見賈思勰，《齊民要術》，卷 10，〈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檳榔〉，頁 600 引《林邑國記》。關於林邑國的地域範圍，參見陳佳榮，《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頁 54-55。

52 詳見姚思廉，《梁書》，卷 54，〈列傳．諸夷．海南諸國．干陁利國〉，頁 794。關於干陁利國的地域範圍，參見陳佳榮，《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頁 56；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64。

幅擴增。例如，張鷟(658-730)《朝野僉載》說：「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為賞宴。」[53]真臘原為扶南國的屬國，此時已經獨立，地點在今之柬埔寨北部和寮國南部。[54]

杜佑(735-812)《通典》提到哥羅國的禮俗「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為禮，多者至二百盤」；[55]干陁利國「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56]丹丹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57]哥羅國和丹丹國的地點都是在目前馬來西亞境內。[58]干陁利國在印尼蘇門答臘的巨港。

袁滋(749-818)《雲南記》說雲南「多生大腹檳榔」，但也指出其根源是「彌臣國來」。[59]彌臣國在當今緬甸西南方。[60]

樊綽(活躍於 862-864)《蠻書》(又稱《雲南志》、《南夷志》)說崑崙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諸香藥。」[61]崑崙國的地點應該是在當今緬甸薩爾溫江(怒江)口附近，或是在泰國境內。[62]

53 詳見張鷟，《朝野僉載》，卷 2，頁 23。

54 關於真臘國的地域範圍，參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64。

55 詳見杜佑，《通典》，卷 188，〈邊防四・南蠻下・哥羅〉，頁 5089。按：杜佑是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詳見劉昫等，《舊唐書》，卷 147，〈杜佑傳〉，頁 3978-3987。

56 詳見杜佑，《通典》，卷 188，〈邊防四・南蠻下・干陁利〉，頁 5096。

57 詳見杜佑，《通典》，卷 188，〈邊防四・南蠻下・丹丹〉，頁 5102。

58 詳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66-967、972、1060。

59 詳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971，〈果部八・檳榔〉，頁 4437a 引《雲南記》。

60 詳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11-912。

61 詳見樊綽，《蠻書》，卷 10，〈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頁 238。

62「崑崙國」屢見於中國古籍，或指西方崑崙，或指南海崑崙。若是南海崑

五代後晉劉昫(888-947)等撰的《舊唐書》(945 成書)提到林邑國「四時皆食生菜，以檳榔汁為酒」。[63]

此外，北宋初年王溥(922-982)根據唐代蘇冕(734-805)《唐九朝會要》與崔鉉(活躍於 843-846)、楊紹復(?-849)《續會要》所撰成的《唐會要》(961 成書)，提到在「大海之北」的多蔑國「畜有犀象馬牛，果有檳榔子」。[64]多蔑國地在何處，學界眾說紛紜，或認為在今緬甸境內，或認為就是指吉蔑(真臘)。[65]

而北宋歐陽修(1007-1072)根據唐代文獻撰成的《新唐書》，除了提到前述的哥羅、真臘之外，還說原林邑國屬地「環王」(占不勞；占婆)之人「取檳榔瀋為酒，椰葉為席」，[66]並提到闍婆(在今印尼爪哇島上)附近的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67]環王在越南中部。[68]婆賄伽盧的地點應該是在印尼爪哇島東部的錦石(Gresik)一帶。[69]

上述文獻所記載的內容，資料來源不易考定，可能只是作者「聽聞」或是閱讀他人記載而來。除了這種間接性的紀錄之外，當時中國

崙，則或是泛稱中南半島、馬來群島一帶，或是特指其中的某個地區，必須依內容判定。此處所指，一般認為是特指目前緬甸或泰國境內的古代小國；詳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505-508。

63 詳見劉昫等，《舊唐書》，卷 197，〈南蠻、西南蠻列傳．林邑〉，頁 5270。按：劉昫為涿州歸義(今河北涿州市)人；詳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 89，〈劉昫傳〉，頁 1171-1173。

64 詳見王溥，《唐會要》，卷 100，〈多蔑國〉，頁 2130。

65 參見陳鴻瑜，《緬甸史》，頁 23；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69。

66 詳見歐陽修，《新唐書》，卷 222，〈南蠻列傳．環王〉，頁 6297。

67 詳見歐陽修，《新唐書》，卷 222，〈南蠻列傳．驃〉，頁 6307-6308。

68 參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23-925。

69 詳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737-738。

赴海外求法的僧人是在域外和檳榔有了直接的接觸。例如，玄奘大師(600-664)，洛州緱氏縣(今河南偃師市)人，在印度摩揭陀國(Magadha, 即今印度東北部的巴特那 Patna 一帶)那爛陀寺留學時(631-635)，備受禮遇。[70]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說他每天可以獲得的供養和福利包括：

> 擔步羅葉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蔻子二十顆，龍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蘇油、乳酪、石蜜等，皆日足有餘一期之料，數人食不盡。給淨人婆羅門一人，出行乘象，與二十人陪從。免一切僧事。[71]

根據這段記載，玄奘每天可以拿到 20 顆檳榔子，還加上 120 枚的擔步羅(梵文 tāmbūla)葉。[72]

其次，義淨(635-713)，齊州山茌(今山東濟南市)人，在印度和東南亞遊歷、求法的時間超過二十年(671-693)，對於印度及南海諸國的佛教和一般知識(包括檳榔)，相當豐富。[73]他第一次出國是在唐高宗咸亨二

70 詳見楊廷福，《玄奘年譜》，頁 89-172。

71 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卷 1，頁 216b。類似的記載，詳見慧立撰，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3，頁 237a；道宣，《續高僧傳》，卷 4，頁 4520a。按：冥詳、慧立(615-?)、彥悰、道宣(596-667)都是和玄奘同時代或稍晚的人，冥詳、彥悰的生卒年和籍貫都不詳，慧立為豳州新平(今陝西彬縣)人，道宣生於京兆(今陝西西安市)；詳見劉化重，〈《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新論〉，頁 32-39；張婷，〈《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研究〉，頁 4-18；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頁 69-177；陳瑾淵，〈《續高僧傳》研究〉，頁 138-148。

72 梵文 tāmbūla 或譯為荖葉，或譯為檳榔，但此處既有擔步羅葉又有檳榔子，故知此處是指荖葉而非檳榔葉。事實上，tāmbūla 也用來指稱「檳榔嚼塊」，亦即由檳榔子、荖葉及其他香料(如豆蔻、丁香、龍腦等)所組成的嚼塊，其組合成分甚至可以多達 13 種；詳見 Sumati Morarjee, *Tambula: Tradition and Art*, 2-5；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頁 463-464。

73 詳見王邦維，《唐高僧義淨生平及其著作論攷》。

年(671)，由廣州出海，先到室利佛逝國(在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巨港)，次年(672)才從室利佛逝出發前往印度，途中曾到過裸人國，在當地看到「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裸人國是在目前印度的尼科巴群島(Nicobar Islands)。[74]此外，他在敘述「南海」佛教(東南亞的上座部佛教)「受齋軌則」時指出，請僧齋供以三天為期，每一天信徒都有「檳榔請僧」或「檳榔供僧」的儀節。[75]義淨充分認識到檳榔為當地佛教最重要的供養品之一，而且也認識到檳榔具有芳香口氣(口香)、幫助消化(消食)、化除痰癊(去癊)等醫藥功能。[76]

上述這些文獻所提及的檳榔文化流傳的地點，不僅在數量上超過前朝，地理範圍也比前人所認識的擴大了許多(詳見圖 1)。

四、貢賦與貿易的活動

從以上敘述可以知道，檳榔在隋唐五代的醫學領域已經有相當多元的應用，但是，當時檳榔的產地主要都在中國的邊陲之地和境外的東南亞諸國，因此，中央政府及各地的醫藥業者都必須設法取得檳榔。可惜的是，相關的記載非常稀少，從先前所引的本草書，我們知道「南方」的檳榔會「北運」，而且在北運之前會進行乾燥處理，但是，這是個人少量的攜帶、自用，還是商販大量的運輸銷售，則不清楚。不過，有些材料還是容許我們大膽地做一些推測。首先，劉恂《嶺表錄異》記載：

> 檳榔交、廣生者，非舶檳榔，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為檳榔，交阯豪士皆家園植之，其樹莖葉根幹與栟櫚、椰子小異也。[77]

74 詳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頁 907、1006。
75 詳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受齋軌則〉，頁 62-68。
76 詳見林富士，〈檳榔與佛教〉，頁 468-469、474-475。
77 詳見劉恂，《嶺表錄異》，頁 197。

他曾經擔任廣州司馬，因此，對於交州、廣州一帶的檳榔文化應該有親身的接觸和體驗。而根據他的說法，當時市面上的檳榔子應該有兩種，一種是交州、廣州所生產的，俗稱「大腹子」，另一種是「舶檳榔」。雖然他不曾解釋何謂「舶檳榔」及其產地，但從名稱和字面上的意思來看，這應該是指經由船舶運來的檳榔，也就是現代常說的國外進口的「舶來品」。可見檳榔應該是當時中國與外國(包括東南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海洋貿易的貨品之一。[78]

另外，有一則禪宗的語錄似乎也可以印證這樣的推論。北宋釋道原(活躍於 968-1022)的《景德傳燈録》(成書於 1004)記載唐末五代志端禪師(?-969)的一則故事說：

>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79]

這段參禪語錄的主要內容是志端禪師所提問的「泉州沙糖，舶上檳榔」。我們知道，使用甘蔗汁煉製沙糖的技術和傳統源自印度，唐宋時期的中國社會逐漸普遍使用沙糖，[80]而「飲沙糖水，多噉檳榔」是「南海」佛教僧人的飲食習慣。[81]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他所說的「泉州沙糖，舶上檳榔」都是指「外來」之物，而且是來自海上的船舶，[82]檳榔的「國

78 關於唐代藥物的產地和交易情形，詳見于賡哲，〈唐代藥材產地與市場〉，頁 75-104。

79 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22，〈福州林陽志端禪師〉，頁 381b。類似的內容也可見於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 10，〈林陽端禪師〉，頁 4b-5a。

80 詳見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迹——中華蔗糖史》。

81 詳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受齋軌則〉，頁 62-66。

82 林富士，〈檳榔與佛教〉，頁 483-485。

際貿易」活動在當時應該已經展開。[83]

在傳統中國，跨國的貿易往往是藉由「朝貢」形式或是與「朝貢」活動結合進行。奇怪的是，這段時間涉及檳榔的「朝貢」記載非常罕見，我們只知道在五代末期，占城(即林邑國；占婆國)曾經「遣使入貢」，送給定都金陵的南唐後主李煜(961-975 在位)諸多「土產」，其中有「檳榔五十斤」，李煜則在北宋太祖(960-976 在位)乾德四年(966)轉而將該批「禮物」獻給汴京(開封)的宋廷。[84]

除了從國外進口之外，當時中國所轄的領土其實也有部分地區生產檳榔，因此，政府可以透過賦稅的方式取得檳榔。事實上，最晚從唐玄宗(712-756 在位)開元年間(713-741)起，交州、愛州、峯州的貢賦中都有檳榔，不過，數量似乎不多，以愛州的「元和貢」來說，才五百顆。[85]即使是以整個安南都護府(交州總管府；交州都督府；鎮南都護府)計算，也才二千顆。[86]雖然如此，這畢竟顯示當時政府已注意到檳榔是當地的代表性物產，且具有商品價值。這是中國政府徵收「檳榔稅」的開端。

五、文學意象的營造

從漢代以來，檳榔除了在實體世界占有位置之外，在文學天地也

83 唐代的嶺南(尤其是廣州)、福建、揚州等地都是當時「國際貿易」的據點，而且有專門買賣藥物的商人和店舖。參見于賡哲，〈唐代藥材產地與市場〉，頁 86-92。

84 詳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占城〉，「太祖・乾德四年」條，頁蕃夷 4 之 63。

85 詳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 38，〈嶺南道・交州〉，頁 9b；〈嶺南道・愛州〉，頁 12a；〈嶺南道・峯州〉，頁 14a。

86 詳見杜佑，《通典》，卷 6，〈食貨六・賦稅下・大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安南都護府〉，頁 128。

一直是書寫與歌詠的對象，不過，在隋唐之前的文學作品中，檳榔主要都是現身於「詠物」詩，[87]以及「博物志」的文學類型中，作者只是羅列檳榔植物、動物、器物的名稱，或是描述檳榔的品貌、物性與相關禮俗，其主要用意都是在於炫耀自己的博聞廣知，或是頌揚物品擁有者的財富與崇偉，有時則藉物言志、抒情。[88]隋唐五代文學的檳榔書寫，雖然也繼承了這樣的傳統，但也營造不少檳榔的新意象。

(一)詠物詩

在「詠物」詩的文類中，我們可以看到沈佺期(656-714)〈題椰子樹〉說：

> 日南椰子樹，香囊出風塵。叢生調木首，圓實檳榔身。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林果，移根隨漢臣。[89]

沈佺期是相州內黃(今河南安陽市內黃縣)人，算是北人。這是他在唐中宗(兩次在位，於 684 年與 705-707 間)神龍二年(706)被流放到驩州(治所在今越南义安省榮市)時的作品。[90]他所歌詠的對象是椰子樹，但在描述其外形的時候，卻用「檳榔身」來說明其「圓實」。這是藉物言物的詠物詩。

其次，仲子陵(743-802)〈洞庭獻新橘賦〉說：

> 皇帝垂衣裳而治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包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物之咸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本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寰海。元侯布較，下吏旁採。……橘之名

87 關於中國文學的「詠物」傳統，詳見趙紅菊，《南朝咏物詩研究》；于志鵬，《宋前咏物詩發展史》。

88 參見容媛，〈檳榔的歷史〉，頁 1-51；林富士，〈檳榔入華考〉，頁 94-100。

89 詳見沈佺期，《沈佺期詩集》，卷 2，〈題椰子樹〉，頁 84。

90 詳見查洪德編，〈沈佺期年譜〉，頁 218-230。

> 也則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於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遺檳榔於後塵。然出自荒陬，升聞莫由。煙波無已，歲月空流。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儻草木之可儔，希成名於入貢。[91]

仲子陵是嘉州峨眉縣(今四川峨眉縣)人，雖然是進士出身，也曾經在中央任官，但職位都不高。[92]這首詩藉物言志，以「湖海清和，遠人修貢」為韻，一方面頌讚皇帝英明，讓邊遠的洞庭地區獻橘到朝廷，另一方面則讚美橘子的「德性」，並用來自喻。至於檳榔和荔枝則是用來襯托橘子的高超與美味。使用不同之物相互比較，也是詠物詩的一種類型。

白居易(772-846)〈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楊萬州八使君〉也有類似的手法，他說：

> 奇果標南土，芳林對北堂。素華春漠漠，丹實夏煌煌。葉捧低垂戶，枝擎重壓牆。始因風弄色，漸與日爭光。夕訝條懸火，朝驚樹點妝。深於紅躑躅，大校白檳榔。……早歲曾聞說，今朝始摘嘗。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潤勝蓮生水，鮮逾橘得霜。……近南光景熱，向北道途長。不得充王賦，無由寄帝鄉。唯君堪擲贈，面白似潘郎。[93]

白居易是「北人」，[94]這是他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從江州司馬

91 詳見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515，〈仲子陵．洞庭獻新橘賦〉，頁 5239。

92 詳見何易展，〈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生平考述〉，頁 36-40。

93 詳見白居易，《白居易詩集》，卷 18，〈律詩．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頁 1450-1451。

94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出生於河南新鄭，後來移居陝西渭南(唐代下邽)，算是北方人，但入仕之後，有不少時間都在南方任官(包括江西、四川、浙江、江蘇)。關於白居易的生平經歷，詳見朱金城，《白居易年譜》；平岡武夫，《白居易——生涯と歲時記》，頁 91-272；黃錦珠，《白居易——

轉任忠州刺史之後，第一次吃到荔枝之後的讚嘆。他在歌詠一番後，還寄贈他的朋友楊歸厚(約 776-831)。主角是荔枝，檳榔、紅躑躅(杜鵑花)、蓮、橘等物則被用來比較。這也是物類相較的詠物詩。

再者，曹鄴(816-878?)賴以成名的〈四怨三愁五情詩〉中的「四情」一詩說：

> 檳榔自無柯，椰葉自無陰。常羨庭邊竹，生筍高於林。[95]

曹鄴是桂州陽朔縣(今廣西桂林市陽朔縣)人，這在寫自己的無依無靠。據說他在長安居住十年，九次應考都落第，後來就是以 12 首〈四怨三愁五情詩〉為當時政要所賞識，才能踏入仕途。[96]

此外，在劉禹錫(772-842)創制「竹枝詞」之後，[97]晚唐詩人皇甫松，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縣)人，便利用這種詩體來描述地方風物，[98]檳榔也進入「竹枝詞」的範疇。他寫道：

> 檳榔花發鷓鴣啼，雄飛煙瘴雌亦飛。木棉花盡荔支垂，千花萬花待郎歸。芙蓉並蒂一心連，花侵槅子眼應穿。筵中蠟燭淚珠紅，合歡桃核兩人同。斜江風起動橫波，劈開蓮子苦心多。山頭桃花谷底杏，兩花窈窕遙相映。[99]

由詩所提及的動、植物來看，他所描述的應該是嶺南風光。這大概是

平易曠達的社會詩人》。

95 詳見曹鄴，《曹鄴詩》，〈四怨三愁五情詩十二首并序〉，頁 4。按：此詩首二句其實是出自西晉左思(約 250-305)〈吳都賦〉的「檳榔無柯，椰葉無陰」。

96 參見尹楚彬，〈曹鄴生平考辨〉，頁 28-33；李純蛟，〈晚唐詩人曹鄴生平略考〉，頁 37-39。

97 關於竹枝詞的發展，詳見孫杰，《竹枝詞發展史》。

98 皇甫松生卒年不詳，其父皇甫湜(777-835)與劉禹錫為同時之人；詳見歐陽修，《新唐書》，卷 176，〈皇甫湜傳〉，頁 5267-5268。

99 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891，〈皇甫松十八首．竹枝〉，頁 10068。

歷代以「竹枝」(又名「巴渝辭」)寫檳榔的開端，而且，也是首度在詩篇中將檳榔與南方的瘴癘相提並論。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物名詩」。所謂「物名詩」是指援用物品名稱或其諧音字的詞意入詩，詩意與具體物品的形貌或是所代表的意象，往往未能完全吻合，[100]但此詩相當高明，具體物品、物品名稱的詞意與詩意三者密切結合。

這種物名詩，有時會以較為鬆散、自由的形式出現在民俗文學中，例如，敦煌文書中的《秋胡變文》(S.133)有一段敘述主角(秋胡)「入山求仙」的情節，描述仙人所居的山林有「花藥茂樹」：

> 並是白檀烏楊，歸樟蘇方，梓檀騰女，損風香氣，桃李橄子，含美相思，氣非益智檳榔。[101]

檳榔在俗文學中首次現身，似乎就在初唐時期。[102]

(二)藥名詩

「物名詩」的文類中，最為突出、數量最多的應該是「藥名詩」，其起源最晚可以追溯到南朝，唐代詩人也有若干創作，[103]不過，以目前可見的藥名詩來看，以檳榔入詩在宋代以前只見於俗文學作品。例

100 明代徐師曾(1517-1580)稱這種文體為「雜名詩」；詳見田中謙二，〈藥名詩の系譜〉，頁 206-208。

101 詳見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6，〈秋胡變文〉，頁 982。另參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卷 2，〈秋胡變文〉，頁 155。

102 《秋胡變文》的創作時代考證不易，但從內容判斷，這應該是「九經」觀念盛行之時或之後的作品，且此一抄本的另一面(正面)抄錄《春秋左傳杜注》有「民」字「缺筆」的情形，因此，《秋胡變文》很可能抄錄於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629-649)或其後。因此，在此姑且判定《秋胡變文》為初唐作品。相關討論，詳見王偉琴，《敦煌變文作時作者考論》，頁 82-83。

103 詳見田中謙二，〈藥名詩の系譜〉，頁 205-229；歐天發，〈藥名文學之原理及其形式之發展〉，頁 493-513；王偉，〈唐宋藥名詩研究〉。

如，敦煌文書中的《伍子胥變文》(P.2794)有一段敘述伍子胥逃往吳國途中「乞食遇妻」的情節，其妻「遂作藥名[詩]」問曰：

> 妾是仵茄之婦細辛，早仕於梁，就禮未及當歸，使妾閑居獨活。膏萇薑芥，澤瀉無憐(鄰)，仰歎檳榔，何時遠志。近聞楚王無道，遂發豺狐(柴胡)之心，誅妾家破芒消，屈身苜蓿。葳蕤怯弱，石膽難當，夫怕逃人，茱萸得脫。潛形菌草，匿影藜蘆，狀似被趁野干，遂使狂夫萇茗。妾憶淚霑赤石，結恨青箱。夜寢難可決明，日念舌乾卷柏。聞君乞聲厚朴，不覺躑躅君前，謂言夫壻麥門，遂使蒞蓉緩步。看君龍齒，似妾狼牙，桔梗若為，願陳枳殼。[104]

這段文字因涉及相當多的諧音字與古語，歷來校讀、註釋者對於細部文字、文句的解讀，意見紛歧，不過，整體而言，大多不否認通篇是以藥名行文、入詩。[105]其所提及的常用藥物相當多，檳榔赫然入列。

(三)送別詩

送別、送行是中國詩歌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文學母題和類型，而檳榔首度進入送別詩中，似乎是在中晚唐時期。李嘉佑(728?-784?)〈送裴宣城上元所居〉一詩說：

> 水流過海稀，爾去換春衣，淚向檳榔盡，身隨鴻雁歸，草思晴後發，花怨雨中飛，想到金陵渚，酣歌對落暉。[106]

104 詳見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5，〈伍子胥變文〉，頁 840。另參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卷 1，〈秋胡變文〉，頁 10。

105 詳見范新俊，〈敦煌「變文」中的藥名詩〉，頁 19；劉瑞明，〈《伍子胥變文》的藥名散文新校釋〉，頁 70-73。

106 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06，〈李嘉祐．送裴宣城上元所居〉，頁 2146。

李嘉佑是趙州(今河北趙縣)人，曾經因故被貶謫到南方，先任江西鄱陽(今江西鄱陽)令，後任江陰(今江蘇江陰)令，再遷轉台州(今浙江台州)刺史、袁州(今江西宜春市袁洲區)刺史。此外，他也曾經在蘇州(今江蘇蘇州)居住數年。[107]此書的寫作年代和地點不明，或以為是在他鄱陽令任內，[108]但由詩中提到「水流過海稀」、「身隨鴻雁歸」來看，這詩或許是作於海邊，而且可能是友人即將循海路返回北方時的送別之作。因此，這可能是他在台州刺史任內所作。而詩題中的「上元」若是指唐肅宗(756-762 在位)的年號，那麼，傅璇琮(1933-2016)認為李嘉佑在上元二年(761)春天轉任台州刺史的說法應該可以成立，事實上，詩云「爾去換春衣」也說明這是春天的詩作。[109]總之，從「淚向檳榔盡」一句來看，當時送別時兩人或許曾以檳榔酬酢。

此外，元稹(779-831)〈送嶺南崔侍御〉一詩則說：

> 我是北人長北望，每嗟南雁更南飛，君今又作嶺南別，南雁北歸君未歸。……火布垢塵須火浣，木綿溫軟當綿衣。枕榔麵硃檳榔澀，海氣常昏海日微。蛟老變為妖婦女，舶來多賣假珠璣。此中無限相憂事，請為殷勤事事依。[110]

元稹祖籍河南府河南縣(今河南洛陽市)，但生長於長安(今陝西西安)，確實

107 關於李嘉佑的生平、貶謫、任官歷程及其相關年代，爭議甚多，意見紛紜，相關研究詳見傅璇琮，〈李嘉祐考〉，頁 220-237；儲仲君，〈李嘉祐詩疑年〉，頁 134-170；蔣寅，《大曆詩人研究》，頁 60-74；沈文凡、楊海霞，〈唐代大歷詩人李嘉祐研究述評〉，頁 25-28；楊丁寧，〈唐大曆詩人李嘉祐生平交游的幾個問題〉，頁 63-66；郎瑞萍、葉會昌，〈大曆詩人李嘉佑貶謫期間的詩歌論略〉，頁 80-81。

108 詳見儲仲君，〈李嘉祐詩疑年〉，頁 169。

109 詳見傅璇琮，〈李嘉祐考〉，頁 226。

110 詳見元稹，《元稹集》，卷 17，〈律詩．送嶺南崔侍御〉，頁 202。

是「北人」。[111]這是他在唐憲宗元和五年至九年(810-814)被貶放為江陵府(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縣)士曹參軍時的作品，[112]贈詩的對象是當時被貶謫到嶺南的崔韶(曾任侍御史)。[113]元稹似乎不曾到過嶺南，因此，詩中所提到的嶺南種種物事民情，可能是間接聽聞，或是當時北方文人對於嶺南的刻板印象、共同想像，檳榔則是主要標記之一。不過，這首送別詩的寫作時間點是在別後，而非別前。無論如何，此後士人的送別詩，凡是送人到嶺南者，或是贈給貶謫在嶺南的友人，以檳榔入詩幾乎成為俗套。而其樣板的製造者，應該可以說是元稹。

(四)典故

以歷史典故入詩也是中國傳統詩人慣用的手法，而第一個入詩的檳榔典故是東晉劉穆之(360-417)的故事。根據《南史》的記載，劉穆之年少時家貧，妻子卻是豪門江嗣之女。他常到妻家「乞食」而受辱。有一次他到江家赴宴後索求檳榔，妻舅江氏兄弟奚落他說：「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後來，劉穆之官拜丹陽尹，富貴騰達，於是召來江氏兄弟宴飲，醉飽之後，令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算是報恩，也算是「復仇」。[114]李白(701-762)在〈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這首詩中，便以這則故事自勉、言志：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

111 關於元稹的家世和生平，詳見卞孝萱，《元稹年譜》；花房英樹、前川幸雄，《元稹研究》。

112 詳見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 563-564；卞孝萱，《元稹年譜》，頁 235-236。

113 崔韶同時和元稹、白居易交好，多次出現在元、白詩中；詳見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 212。

114 詳見李延壽，《南史》，卷 15，〈劉穆之傳〉，頁 427。

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115]

李白是名人，但家世不詳，出生地至少也有西域、蜀地兩種主流的說法。儘管眾說紛紜，大多認為李白在二十四歲(724)之前，應該都在蜀地居住、活動，或認為曾經寄籍劍南道綿州(今四川江油市昌隆縣)。其後，遊歷各地，直到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也就是三十歲那年，才首度入長安，想接近權貴、謀求功名。[116]此詩就是當年受到「冷遇」時所寫，地點是在終南山樓觀的「玉真公主別館」。[117]但贈詩的對象衛尉張卿究竟是誰，不易斷定，無論如何，「衛尉卿」是三品官，若是「衛尉少卿」則是四品官，而且，這位張卿很可能是駙馬張垍(?-763)，[118]因此，詩中的「丹徒布衣」既指出身貧微的劉穆之，便只是李白自喻、自況、自勉，希望有一天也能由貧賤變富貴。但李白會用劉穆之的檳榔典故，或許也和衛尉張卿的身份有關，因為，假如他是駙馬，那麼，無論他出身如何，和皇家相較，仍然算是低人一等，處境和娶了豪門江氏之女的劉穆之還是有點類似。

無論如何，李白此詩一出，後來的詩人用這個典故講貧賤與富貴、男子與妻家(舅家；外家)關係的作品便日益增多。不過，在唐、五代時期，跟進者還不多。唯盧綸(745-800?)〈酬趙少尹戲示諸姪元陽等因以見贈〉說：

八龍三虎儼成行，瓊樹花開鶴翼張。且請同觀舞鸚鴝，何須竟哂食檳榔。歸時每愛懷朱橘，戲處常聞佩紫囊。謬入阮家逢慶

115 詳見安旗等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開元十八年．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頁 112-113。

116 詳見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

117 詳見安旗等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 111-114。

118 詳見李清淵，〈李白贈衛尉張卿詩別考〉，頁 54-59；郁賢皓，〈李白詩中「衛尉張卿」續考〉，頁 53-54；郁賢皓，〈再談李白詩中「衛尉張卿」和「玉真公主別館」——答李清淵同志質疑〉，頁 101-106。

樂，竹林因得奉壺觴。[119]

這首詩所用的典故大多是晉代貴顯家族子弟的佳話、軼事，意在讚美趙氏(趙密)「諸姪」的人品與才華，顯揚趙氏一門顯赫。因此，「何須竟哂食檳榔」一語，應該是要藉劉穆之年輕時索食檳榔而被哂笑的故事，用來做對比。但是，這或許有自況之意，因盧綸幼年喪父，曾經寄食於舅家(外家)，或許曾經遭受冷落與羞辱。此外，趙密很可能就是盧綸的妻舅。[120]

(五)情色

當代臺灣因為檳榔攤林立，「檳榔西施」打扮非常顯眼，曾經引發各界的注目與議論，檳榔也被貼上「情色」與「不良」社會風氣的標籤。不過，這並非當代才有的現象。[121]例如，清代的新竹貢生林占梅(1821-1868)在談臺南的「妓家風氣」時曾經提到妓女「款客捧檳榔」，[122]而丁紹儀(約 1815-1884)《東瀛識略》(1873)則說北臺灣的「娼家」會利用妓女口嚼得檳榔汁施行「法術」，藉以羈縻客人。[123]

事實上，檳榔與情色沾連也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唐代長安就是

119 詳見盧綸，《盧綸詩集》，卷 2，〈酬趙少尹戲示諸姪元陽等因以見贈〉，頁 142-145。

120 盧綸為河中蒲縣(今山西省永濟縣蒲州鎮)人，似乎是出身望族之後，但其父祖輩任官並不顯赫，只是下層官吏之家。關於其生平，詳見傅璇琮，〈盧綸考〉，頁 469-492；蔣寅，《大曆詩人研究》，頁 233-252；趙林濤，《盧綸研究》。

121 詳見林富士，〈試論影響食品安全的文化因素——以嚼食檳榔為例〉，頁 43-104。

122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乙卯(咸豐五年)．與客談及崁城妓家風氣偶成〉，頁 72-73。

123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 3，〈習尚〉，頁 36。

先例。例如，張鷟《遊仙窟》在描述男主角進入崔十娘「臥處」所見的場景時說：

> 屏風十二扇，畫鄣五三張。兩頭安綵縵，四角垂香囊。檳榔荳蔻子，蘇合綠沉香。織文安枕席，亂綵疊衣箱。[124]

張鷟是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人，這篇小說創作於青年時期，雖然是小說，但場景可能是根據他在長安時期「冶遊」歡場的經驗而來。或許也可以說，「遊仙窟」反映了當時長安士人、官員「逛妓院」的浪蕩風尚。[125]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當時妓女房間的擺設物品之一就是檳榔。

《遊仙窟》是隱喻性的描述，或許是出自作者想像，但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在江州司馬任內所寫的〈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則是追憶自身的經驗之作。[126]詩的前半段，他寫的是昔日「長安舊遊」的往事。而他追憶所得的往事，也就是最讓他難以忘懷的京城舊事，就是在平康坊的歡宴、幽會與風流。當時的平康坊是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學者、達官貴人、各地顯要、富商巨賈經常出入、流連此地，這也是妓女所居之地。白居易顯然曾經是這裡的常客。從此詩來看，他相當熟悉當地妓院的位置、景觀與特徵，也知道若干名妓的特色。[127]而在描述妓女的裝扮時，他說：

> 時世高梳髻，風流澹作妝。戴花紅石竹，帔暈紫檳榔。鬢動懸

124 詳見張鷟，《遊仙窟》，頁 28。

125 詳見李時人、詹緒左校注，《遊仙窟校注》，〈前言〉，頁 1-71。

126 白居易，《白居易詩集》，外集，卷上，〈詩補遺．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頁 2898-2902。

127 關於唐代的妓女、妓院，及其與士人、文學的關係，詳見宋德熹，〈美麗與哀愁——唐代妓女的生活與文化〉，頁 165-219；鄭志敏，《唐妓探微》。關於白居易在長安的住所、生活與妓館的關係，詳見妹尾達彥，〈白居易と長安．洛陽〉，頁 270-296。

蟬翼，釵垂小鳳行。拂胸輕粉絮，煖手小香囊。[128]

此處，他提到了檳榔，但卻使用了「紫檳榔」一詞，令人費解。因為，「紫檳榔」可以說是一種檳榔的名字，也可以說是一種紫色的檳榔子。[129]無論如何，我想他在詩中要強調的是紫色，因此，「帔暈紫檳榔」可以理解為妓女身上披著紫色暈染的披肩。但他會使用檳榔來形容紫色，或許是因為他當年在長安妓女的房間確實看過檳榔，而當他流落到南方之後，對於檳榔或許更加熟悉。於是，在這一篇懷舊的追憶詩作中，新舊經驗交織出「紫檳榔」一詞。

無論唐代長安城的妓院或妓女身上是否真有檳榔，從此之後，中國文人在描述情色場景的時候，無論是寫實還是想像，檳榔常成為重要的物件。

128 白居易，《白居易詩集》，外集，卷上，〈詩補遺．江南喜逢蕭九徵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頁 2898-2899。

129 和這一句對仗的是「戴花紅石竹」，「紅石竹」既可以說是一種花名，也可以說是指紅色的石竹花。同樣的，「紫檳榔」可以說是一種檳榔的名字，也可以說是一種紫色的檳榔子。若是指檳榔的名字，那麼，此物又叫馬檳榔、馬金囊、水檳榔，也有人認為就是文官果。但這就和檳榔是兩種不一樣的植物。若說這是指紫色的檳榔，那麼，這或許是指經過乾燥處理的檳榔子切片(有些會呈現暗紫色)，或是一種「內有紫文」的檳榔品種，或許就是產於麻逸國的「麻逸檳榔」(「其色紫赤油澤」)。當然，也不能排除當時人會用檳榔花或檳榔子染紫的可能性。不過，這畢竟是追憶之作，而且，詩作有時為了對仗、聲韻，難免會脫離現實。換句話說，在白居易的知識世界中，他是否能辨別紫檳榔與檳榔之別，或是真正接觸過「麻逸檳榔」，或是看過紫色的檳榔子，不無疑問。關於檳榔、紫檳榔的名物問題，詳見蘇頌，《本草圖經》，卷 10，〈木部中品．檳榔〉，頁 373-374；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 13，〈木部中品．檳榔〉，頁 514；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31，〈果部．夷果．檳榔〉，頁 1829-1831；卷 31，〈果部．夷果．馬檳榔〉，頁 1845；檀萃，《滇海虞衡志》，卷 10，〈志果〉，頁 70。

六、地域與階層的擴散

在這段期間，檳榔文化的核心區域仍然是嶺南地區。當時中國境內最主要的檳榔產地就在這個區域，前引唐初的官修本草著作《新修本草》記載檳榔「生交州、愛州及崑崙」，[130]劉恂《嶺表錄異》也說檳榔此物「交阯豪士皆家園植之」，[131]而唐代各地貢賦中有檳榔的也只有嶺南道所轄的安南都護府，尤其是交州(今越南河內一帶)、愛州(今越南中北部的清化省)和峯州(今越南東北部的富壽省東南部和河西省西北部)。[132]

此外，鑑真(689-763)和尚等人在東渡日本的過程中則目睹、記錄了海南島的檳榔。[133]根據日本僧人元開(真人元開；淡海三船，722-785)所撰的《唐大和上東征傳》，唐玄宗天寶七年(748)，鑑真應日本來華僧人榮叡、普照等弟子的邀請，打算東渡日本傳法，途中曾經漂流到海南島。他們在岸州(海南島的東北和北方一帶)住在開元寺，當地官員「施物盈滿一屋」，其中有當地的「珍異口味」，包括「益知子、檳榔子、荔支子、龍眼、甘蔗」。[134]這似乎是海南檳榔首次見於文獻紀錄。

嶺南不僅是檳榔的主要產地，也是嚼食風氣最盛的地區。《新修

130 蘇敬，《新修本草》，卷 13，〈木．檳榔〉，頁 646。

131 詳見劉恂，《嶺表錄異》，頁 197。

132 從行政區域來說，嶺南道是唐代貞觀十道之一，所轄範圍包括今福建、廣東、海南、廣西壯族自治區大部分地區、雲南東南部、越南中北部地區。開元時期則將今福建境內的福州、泉州、建州、汀州等地改隸江南東道。關於唐代的行政區劃及嶺南道的地理範圍，詳見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上冊，頁 506-518、571-748；下冊，頁 1185-1219、1456-1458、1462-1471。

133 鑑真為廣陵江陽縣(今江蘇揚州江都縣)人，關於鑑真及其東渡日本的經過，詳見杉山二郎，《鑑真》；郝潤華，《鑑真評傳》，頁 125-180。

134 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收入《遊方記抄》，卷 1，頁 991b。

本草》便說：

> 交州、愛州人云：蒟醬，人家多種，蔓生，子長大，謂苗為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辛而香也。[135]

可見當地不僅種檳榔，也種浮留藤(荖藤)，而且會用浮留藤的葉子包檳榔來吃。而劉恂《嶺表錄異》也說：

> 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婁藤兼之瓦屋子灰，競咀嚼之。……廣州亦敬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136]

由此可見，當時安南(今越南中北部)大概男女老少都有吃檳榔的習慣，而廣州也有這樣的風氣，只是不如安南。他們的吃法一如傳統，也就是檳榔子、荖藤(不婁藤；浮留藤；扶留藤)、石灰(瓦屋子灰)三合一的標準食法。[137]此外，前引段公路《北戶錄》曾經提到瓊州(今海南海口、瓊海一帶)、崖州(今海南海口、瓊山、文昌、澄邁一帶)、高州(今廣東高州市)、潘州(今廣東高州市)人會「以糖煮嫩大腹檳榔」食用，則是另一種吃法。[138]

除了嶺南之外，當時雲南的檳榔文化也值得留意。早在兩晉之際，魏完(約 265-342)《南州八郡志》便已提到南州(寧州)八郡生產檳榔，當地人認為這是「貴異」之物，在婚禮、待客之時，會用來款待親友。[139]大約成書於東晉末至南朝初期的徐衷(活躍於 420)《南方草物狀》也說「交阯、武平、興古、九真」出產檳榔。[140]其中，興古郡主要在今雲南文山市壯族苗族自治州。

---

135 詳見唐慎微撰，寇宗奭衍義，張存惠重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 9，〈草部中品之下．蒟醬〉，頁 41b 引《新修本草》。

136 詳見劉恂，《嶺表錄異》，頁 197。

137 關於嚼食檳榔的方式，詳見林富士，〈試論影響食品安全的文化因素〉，頁 51-52、67-77。

138 詳見段公路，《北戶錄》，卷 2，〈食目〉，頁 16 下。

139 詳見繆啟愉、邱澤奇輯釋，《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輯釋》，頁 116-117。

140 詳見繆啟愉、邱澤奇輯釋，《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輯釋》，頁 77。

而唐代袁滋(749-818)《雲南記》對於當地的檳榔文化著墨更多，他說：

> 雲南多生大腹檳榔，色青，猶在枝朵上，每朵數百顆。云是彌臣國來。[141]

這不僅介紹了雲南檳榔的名稱、物性，也說明了品種的來源是彌臣國(在今緬甸西南方)。其次，《雲南記》還記載了當地食用檳榔的各種方式：

> 雲南有大腹檳榔，在枝朵上，色猶青，每一朵有三二百顆。又有剖之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陰乾則可久停。其青者，亦剖之，以一片青葉及蛤粉卷和嚼噬，其汁即似減澀味，雲南每食訖則下之。[142]

又說：

> 雲南有檳榔花糝，極美。[143]

又說：

> 平琴州有檳榔，五月熟。以海螺殼燒作灰，名為奔蛤灰，共扶留藤葉和而嚼之，香美。[144]

袁滋祖籍陳郡汝南(今河南汝南)，蔡州郎山(今河南確山)人，雖是北方人，但曾經出使南詔(雲南)，[145]因此，《雲南記》所記應該是他的親身見

141 詳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971，〈果部八・檳榔〉，頁 4437a 引《雲南記》。

142 詳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971，〈果部八・檳榔〉，頁 4437a 引《雲南記》。

143 詳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971，〈果部八・檳榔〉，頁 4437a 引《雲南記》。

144 詳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971，〈果部八・檳榔〉，頁 4437a 引《雲南記》。按：當時唐代雲南基本上劃歸劍南道姚州管轄，但平琴州屬嶺南道；詳見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上冊，頁 644-646；下冊，頁 1300-1310。

145 詳見劉昫，《舊唐書》，卷 185，〈袁滋傳〉，頁 4830-4831；歐陽修，《新唐書》，卷 151，〈袁滋傳〉，頁 4824-4825。

聞。[146]由此可見，當地吃檳榔可以生食青檳榔或乾檳榔，也可以用檳榔花調和米飯煮熟來吃。生食檳榔則會「卷和」扶留藤葉和蛤粉(蛤灰)來吃。而從「每食訖則下之」一語來看，當時雲南人飯後吃檳榔似乎已經相當普遍。

至於雲南境內主要的檳榔產地，除前述的平琴州(治所在今廣西玉林市)之外，樊綽《蠻書》載說：

> 荔枝、檳榔、訶黎勒、椰子、桄榔等諸樹，永昌、麗水、長傍、金山並有之。[147]

永昌城在今雲南保山市，麗水城在今雲南盈江縣，[148]至於長傍、金山，應該是指當時永昌、麗水附近的長傍山和金山。[149]樊綽的生平不詳，只知他曾經在唐懿宗咸通三年至四年(862-863)擔任安南經略使蔡襲的幕僚，在咸通六年(864)擔任夔州都督府長史，他在西南一帶的任務就是協助政府防備南詔的侵擾，調查、搜集、整理與雲南相關的歷史、風土、人情、物產是他重要的工作。[150]因此，此一檳榔產地的敘述應該有所根據。總之，從三、四世紀時的「貴異」之物，到八、九世紀的尋常飯後之物，在這段期間，雲南栽種檳榔的數量應該有大幅的增長。

嶺南另一個鄰近地區福建(閩)，在隋唐之前，並無任何文獻提及當地有檳榔文化的痕跡。當然，寬泛來說，福建也可以說是古代南越國的一部分，唐初也隸屬於嶺南道，因此，我們也不能說隋唐以前的福建絕對沒有檳榔的痕跡或紀錄。不過，具體提到福建檳榔的文獻，似

146 關於袁滋出使南詔的經過與《雲南記》的內容，詳見屈直敏，〈袁滋《雲南記》考略〉，頁 140-147。

147 詳見樊綽，《蠻書》，卷 7，〈雲南管內物產〉，頁 191。

148 詳見李雲晉，〈南詔行政區劃及政區建置考述〉，頁 61-64。

149 詳見樊綽，《蠻書》，卷 7，〈雲南管內物產〉，頁 199。

150 詳見方國瑜，〈樊綽《雲南志》考說〉，頁 1-6。

乎以孟詵的《食療本草》為最早，該書提到：

> 檳榔，多食發熱，南人生食。閩中名橄欖子。所來北者，煮熟、燻乾將來。[151]

孟詵是汝州(今河南汝州市)人，查其一生經歷，似乎一直都在北方(包括首都長安)任官，不過，他與孫思邈過從甚密，且長期研究藥物、醫方，[152]因此，他的檳榔知識應該是有所考究。而根據他的說法，當時閩人以「橄欖子」來稱呼檳榔。因此，當時檳榔應該已經進入福建地區，但是仍非普遍之物，故以他們較為熟知的「橄欖」來稱呼這種外來之物。

檳榔進入福建地區的另一個例證是前引的志端禪師的故事。在故事中，志端提到：「泉州沙糖，舶上檳榔」，[153]我們雖不能確認「泊上檳榔」和沙糖一樣都是在泉州上岸的舶來品，但是，泉州在唐宋元時期正是中國「海上絲路」的重要據點，[154]檳榔在泉州的海舶上，應該是常見之物。[155]而志端是福州人，故事發生的地點在福州林陽山瑞峯院(福建福州市晉安區)，這樣的地緣關係，可能讓志端禪師本身對於「泉

151 孟詵，《食療本草》，頁 23。

152 詳見馬繼興，〈《食療本草》文獻學的研究〉，收入謝海州等輯，《食療本草》，頁 158-170。

153 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22，〈福州林陽志端禪師〉，頁 381 下。類似的內容也可見於釋惠洪，《僧寶傳》，卷 10，〈林陽端禪師〉。

154 詳見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中國航海學會、泉州市人民政府編，《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航海學會、泉州市人民政府編，《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二)》；鄭有國，《中國市舶制度研究》；鄭有國，《福建市舶司與海洋貿易研究》；楊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

155 泉州灣後渚港在 1974 年出土了一艘載滿藥物的宋代海船，可辨識的藥物有乳香、降真香、龍涎香、檀香、胡椒、檳榔等香藥。因此，我們可以推想晚唐、五代的泉州應該有不少這樣的貿易船進出。關於沈船藥物的細節，詳見王慧芳，〈泉州灣出土宋代海船的進口藥物在中國藥學史上的價值〉，頁 60-65。

州沙糖，舶上檳榔」印象深刻，才會在問答中脫口而出。

同樣屬於「南方」的江浙一帶(尤其是首都建康)，在六朝時期已經有檳榔流傳的痕跡，文獻紀錄也有不少。到了隋唐時期，或許因為政治中心在北方，當時士人的書寫較少觸及南方，因此，有關這個地區的檳榔文化，便相當罕見。不過，本文前面已經說過，李嘉佑(活躍於 748-751)提到檳榔的送別詩，很可能是他擔任「台州」(今浙江台州市)刺史時所寫，而且，當時送別時可能會以檳榔相贈。因此，我們相信當地應該有檳榔。

其次，南宋賾藏主《古尊宿語錄》(重刻於 1267)曾提到唐代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市東北)和尚(陳尊宿；道明，792?-895?)和一位座主的對話說：

> 主云：「和尚為什麼在學人缽囊裏？」師云：「有什麼檳榔豆蔻，速將來。」[156]

從道明和尚的話語中，我們可以推斷，當時睦州佛寺中應該備有檳榔、豆蔻(荳蔻)這一類的藥物(食物)。[157]此外，前面也提到過，占城(林邑國；占婆國)曾經「遣使入貢」，送給南唐後主李煜「檳榔五十斤」。[158]南唐首都在金陵(今南京)，可見當時江蘇地區也有檳榔的身影。

除了雲南(南昭；大理)、嶺南(嶺南道)、福建(原屬嶺南道，後屬江南東道)和江南(江南東道)之外，我們知道柳宗元被貶謫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市)時，曾經使用檳榔治病，因此，當時的湖南(原屬江南西道)應該有檳榔。而都城

156 賾藏主，《古尊宿語錄》，卷 6，〈睦州和尚語錄〉，頁 36a。

157 豆蔻(荳蔻)與檳榔都具有「除口氣」、「令口香」的功用，僧人講經、說法、對談，似乎格外需要清新口氣。關於豆蔻(荳蔻)與檳榔的功用，詳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14，〈草部．芳草．豆蔻〉，頁 865-867；卷 31，〈果部．夷果．檳榔〉，頁 1829-1834。關於檳榔和僧人宗教與日常生活的關係，詳見林富士，〈檳榔與佛教〉，頁 485-486。

158 詳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占城〉，「太祖．乾德四年」條，頁蕃夷 4 之 63。

長安與洛陽是政治、商貿中心，因為貢賦及貿易所得及宮廷醫藥所需，也都應該有檳榔流通。[159]至於其他地區，因史料所限，我們很難查考。但是，幸運的是，傳世的敦煌文獻中有不少與檳榔有關的材料，讓我們有一點解讀的空間。

首先，我們發現敦煌遺書有一份殘卷，是一名僧人法照在「辰年正月十五日」所寫的「施物疏」(北大 D162V)，內容是施物清單(包括檳榔五顆)和施捨的對象(其亡過的師父)，[160]可見當地僧人會用檳榔來祭祀往生的老和尚。另有一份敦煌殘卷(S.5901)的主要內容則是某僧為了「和合藥草」，「虧闕頗多」，因此寫信給某位大德(僧人)，乞請賜給多種藥物，其中也有檳榔。[161]因此，我們相信敦煌當地應該可以取得檳榔，至於檳榔是從東南亞走海路上岸輾轉到敦煌，還是從印度透過陸上絲路而來，則無法得知。[162]

在實物之外，敦煌寫本之中，若干不同類型的文獻都提到了檳榔。前述的僧人「施物疏」、「書狀」就是其中兩類。其次，醫藥類的文書，如《張仲景五臟論》(P.2115 背、P.2378 背、P.2755 背)、《雜療病藥方》(P.3378

159 詳見于賡哲，〈唐代藥材產地與市場〉，頁 75-104。

160 詳見法照，〈辰年正月十五日道場施物疏〉(北大 D162V)，收入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 2 冊，頁 158。

161 詳見未名，〈某僧乞請某大德賜藥草狀〉(S.5901)，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 9 冊，頁 206。

162 敦煌地區應該也有藥市、藥肆，但詳情難考。不過，以其鄰近的西州(吐魯番)來說，我們可以知道當地確有大宗的藥物買賣，而從殘存的藥物清單來看，當時市場上的藥物的原產地非常多元，包括朝鮮半島、中國內地、中亞、印度、南亞、東南亞等地，可見當時中國西北的邊地也有跨國性的藥物貿易。詳見姚崇新，〈中外醫藥文化交流視域下的西州藥材市場〉，頁 395-420。

背)以及無書名、篇題的一些「藥方」(P.2882, P.3201, P.3596背、S.3347)都有使用檳榔入藥的治病醫方，[163]這充分顯現，即使在邊地敦煌，檳榔也已被當地的醫家、僧人所熟知。

此外，前述的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秋胡變文》)會提及檳榔，似乎顯示，檳榔的流傳已逐漸向庶民階層擴散。而最足以說明其普及程度者，應該是當時「童蒙」教育用的各種字書、韻書，[164]如《開蒙要訓》(P.2487, P.2578, P.3054, P.3189, P.3243, S.5431)、亡題的「字書」(P.3391, Дx02822)，[165]以及《切韻》(S.2071)等，都有檳榔一詞。[166]

就此而言，檳榔文化在隋唐五代時期似乎已經在敦煌流傳開來，檳榔不僅用於宗教和醫療的場域，也進入俗文學和童蒙書的領域。敦煌距離檳榔產地非常遙遠，檳榔的保存與遠距運輸都很困難，若非有強烈的生活與文化需求，此地要出現檳榔並不容易。

163 詳見袁仁智、潘文主編，《敦煌醫藥文獻真迹釋錄》，頁 8、20、26、302、347、353、369、402。

164 關於敦煌的蒙學教育與教材的問題，詳見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頁 231-270；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屈直敏，《敦煌文獻與中古教育》，頁 252-256；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

165 詳見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4 冊，頁 275；第 16 冊，頁 85；第 21 冊，頁 187；第 22 冊，頁 109、279；第 24 冊，頁 59；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 7 冊，頁 51；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10 冊，頁 62。

166 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 3 冊，頁 242、246、258。

七、結語

整體而言，隋唐五代時期的中國境內，有檳榔生產或流通的地區，明確見於記載或是可以推知的，只有嶺南(大致包括現在的廣東、廣西、海南島和越南中北部)、雲南、福建、江蘇、浙江、湖南、長安、洛陽和敦煌(詳見圖 2)。而有嚼食或食用風氣的，只見於嶺南、雲南和福建，其他地區大多是作為藥物之用。這樣的地理分布，相較於六朝時期，檳榔版圖的變化並不大，嚼食風氣甚至有點縮收。不過，檳榔稅的徵收和檳榔貿易的進行，卻是在這段時期才明確見於紀載。

但是，若不從實物來看，檳榔在這個時期的文化版圖上所留下的漬痕，應該是比六朝時期還要深廣。由於積累了前朝的經驗，隋唐五代的知識分子(包括僧人)對於檳榔名物的認知，已經相當清晰。李善(630-689)等人注《文選》、[167]慧琳(737-820)《一切經音義》、[168]段成式《酉陽雜俎》、[169]段公路《北戶錄》、五代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繫傳》等，[170]都曾援引隋代以前的著作對於檳榔的描述，而最重要的集成之

167 詳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 5，〈賦・京都・左太沖吳都賦〉，頁 213；卷 8，〈賦・畋獵中・司馬長卿上林賦〉，頁 369。按：李善為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市)人；詳見劉昫，《舊唐書》，卷 189，〈李善傳〉，頁 4946。

168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81，頁 835 中。按：慧琳為疏勒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輪台縣喀什噶爾)人，關於其生平及《一切經音義》；詳見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 1-27；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頁 1-30。

169 詳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 16，〈廣動植之一・總敘〉，頁 1121。按：段成式祖籍齊郡鄒平(今山東鄒平縣)，東牟人；詳見許逸民，《酉陽雜俎校箋》，〈前言〉，頁 1-26。

170 詳見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卷 11，〈通釋・二十五部・榔〉，頁 11b。按：徐鍇為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人；詳見陸游，《南唐書》，卷 5，〈徐鍇傳〉，頁 3-5。

作則是歐陽詢等人所編的《藝文類聚》以及一系列醫方著作和本草書。

在承繼與集成之外，隋唐五代的知識分子對於檳榔的醫藥功能有了更新的認識，也有了更多樣的臨床運用；對於檳榔文化在中國域外的分布，有了更多的了解，更親近的接觸；對於檳榔的文學書寫，有了更多樣的表現，更新的意象營造。而且，這時期的檳榔文化還東傳日本。例如，日本奈良時代(710-784)的《東大寺獻物帳》，是光明皇后(701-760)將聖武天皇(701-756)的遺物捨給佛寺的獻物清單，其中有「檳榔子七百枚」。[171]由於這份獻物清單所記載的基本上都是「唐物」，因此，我們相信這些檳榔子應該是來自中國。[172]此外，丹波康賴(912-995)於西元 982 年所編成的《醫心方》，是日本現存的最早的醫書，其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擷取北宋以前的中國醫書，尤其是隋唐時期的醫方，[173]其中，檳榔方多達三十首，治療的疾病包括：藥物中毒、風病、口瘡、口臭、肝病、寄生蟲、腳氣、痰飲、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腹腔疾病、水腫、不孕、小兒疾病等，[174]而且，檳榔在當時已經有「和名」：

171 詳見朝比奈泰彥編修，《正倉院藥物》頁 201-202；中村元，《仏教植物散策》，頁 168-172；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柴田承二監修，《圖說正倉院藥物》，頁 67-68；鳥越泰義，《正倉院藥物の世界——日本の薬の源流を探る》，頁 77-82。

172 關於中古時期(九到十六世紀)日中兩國透過朝貢或貿易所進行的物質交換，參見森克己，《続々日宋貿易の研究》，頁 1-37、51-63、79-126；皆川雅樹，《日本古代王権と唐物交易》；關周一，《中世の唐物と伝来技術》，頁 7-15，16-65。

173 關於《醫心方》的編寫、內容及其流傳與價值，詳見杉立義一，《医心方の伝来》；山本信吉等，《醫心方の研究》；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頁 325-371。

174 詳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 1，〈服藥中毒方〉，頁 16-17；卷 3，〈治一切風病方〉，頁 152；卷 5，〈治緊唇生瘡方〉，頁 245；卷 5，〈治口吻瘡方〉，頁 253；卷 5，〈治口臭方〉，頁 254；卷 6，〈治心腹脹滿方〉，頁 296；卷 6，〈治肝病方〉，頁 300；卷 7，〈治寸白方〉，頁 344-345；

阿知末佐。[175]

這些檳榔文本的作者或文本的主角，就其籍貫或生長的地區來看，可查考者有 42 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北人」，而且分散在華北、華中的各個地區，另有 3 人是「蜀人」(李珣、仲子陵、李白)，只有歐陽詢(今湖南長沙)、劉恂(今江西鄱陽)、鑑真(今江蘇揚州)、李善(今江蘇揚州)、徐鍇(今江蘇揚州)、袁朗(今南京市)、陳叔達(今浙江長興)、皇甫松(今浙江淳安)、睦州和尚(今浙江建德)、日華子(今浙江寧波)、志端和尚(今福建福州)、曹鄴(今廣西陽朔)12 人算是「南人」。因此，根據這些作者的籍貫或出生地來繪製一張檳榔文化的流佈圖(詳見圖 3)，便可知道當時檳榔在中國社會擴散的範圍，或許還不能說是具有「全國性」，但應該已經超過前朝。

(本文於 2018 年 3 月 7 日收稿，2018 年 7 月 10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6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9 月出刊。)

卷 7，〈治蛔蟲方〉，頁 345；卷 8，〈腳氣療體〉，頁 358；卷 8，〈腳氣腫痛方〉，頁 359；卷 8，〈腳氣入腹方〉，頁 364；卷 9，〈治短氣方〉，頁 391；卷 9，〈治奔豚方〉，頁 395；卷 9，〈治痰飲方〉，頁 397；卷 9，〈治宿食不消方〉，頁 403；卷 9，〈治惡心方〉，頁 406；卷 9，〈治噫酢方〉，頁 407；卷 10，〈治癥瘕方〉，頁 426；卷 10，〈治大腹水腫方〉，頁 434-435；卷 20，〈治無子法〉，頁 943；卷 25，〈治小兒口瘡方〉，頁 991；卷 25，〈治小兒寸白方〉，頁 1005；卷 26，〈芳氣方〉，頁 1077-1078。

175 詳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 1，〈諸藥和名〉，頁 48。

圖 1　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周邊的檳榔文化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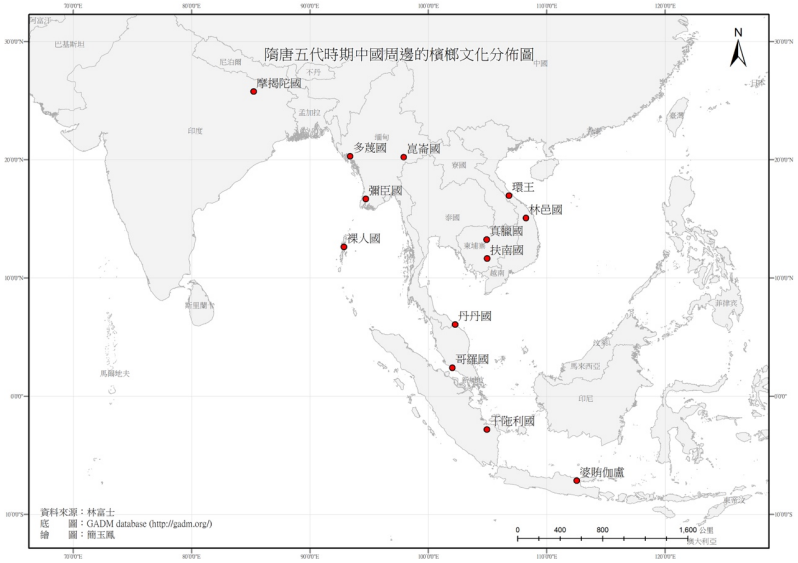


圖 2　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境內的檳榔流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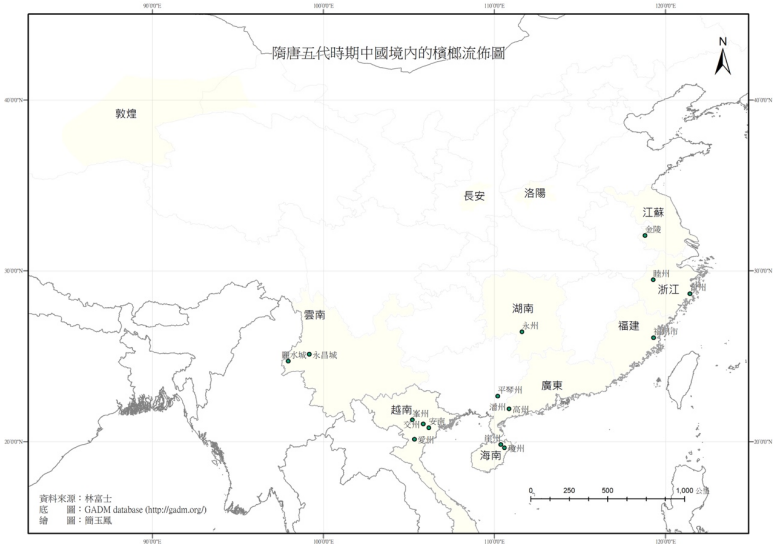


圖 3 隋唐五代時期「檳榔文本」相關人物籍貫或出生地分佈圖



附錄 1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檳榔方」

方名	劑型	對治疾病	出處
慶雲散	散	主丈夫陽氣不足，不能施化，施化無成	卷 2，〈婦人方〉，頁 17b-18a。
五香丸	丸	治口及身臭，令香、止煩散氣	卷 6 上，〈七竅病〉，頁 115a。
炙散除餘風方	散(煮散)	風痺	卷 8，〈諸風〉，頁 168a。
檳榔湯	湯	治肝虛寒，脅下痛脹滿，氣急，目濁，視物不明	卷 11，〈肝藏〉，頁 209a。
下氣湯	湯	治胸腹背閉滿，上氣喘息	卷 13，〈心藏〉，頁 244a。
檳榔湯	湯	破胸背惡氣，音聲塞閉	卷 13，〈心藏〉，頁 244a。
檳榔散	散	治脾寒，飲食不消，勞倦，氣脹，噫滿，憂恚不樂	卷 15 上，〈脾臟上〉，頁 272b。
治胃反朝食暮吐食訖腹中刺痛方	湯	治胃反，朝食暮吐，食訖腹中刺痛	卷 16，〈胃腑〉，頁 292a。
桔梗破氣丸	丸	治氣上下否塞，不能息	卷 17，〈肺藏〉，頁 310b-311a。
檳榔湯	湯	治氣實若積聚，不得食息	卷 17，〈肺藏〉，頁 311a。
治積年患氣，發作有時，心腹絞痛，忽然氣絕，腹中堅實方	湯	治積年患氣，發作有時，心腹絞痛，忽然氣絕，腹中堅實	卷 17，〈肺藏〉，頁 311a。
治熱發氣上衝不得息，欲死不得臥方	丸	治熱發氣上衝不得息，欲死不得臥	卷 17，〈肺藏〉，頁 312a。
茯苓湯	湯	治胸膈痰滿	卷 18，〈大腸腑〉，頁 332a-b。
治胸中痰飲，腸中水鳴，食不消，嘔吐水方	湯	治胸中痰飲，腸中水鳴，食不消，嘔吐水	卷 18，〈大腸腑〉，頁 332b-333a。
治寸白蟲方	湯	治寸白蟲	卷 18，〈大腸腑〉，頁 336b-337a。
槀角丸	丸	治衰老(補腎)。	卷 19，〈腎藏〉，頁 359a-b。
治霍亂使百年不發方	丸	治霍亂使百年不發	卷 20，〈膀胱腑〉，頁 368a-b。
檳榔湯	湯	治服散之後，忽身體浮腫	卷 24，〈解毒并雜治〉，頁 436a。

附錄 2　王燾《外臺秘要》「檳榔方」

方名	劑型	對治疾病	出處
木香犀角丸	丸	防諸瘴癘及蠱毒等	卷 5，〈癘病〉，頁 159b-160a。
檳榔散	散	療吐酸水	卷 6，〈霍亂及嘔吐〉，頁 193b。
茯苓湯	湯	療常吐酸水脾胃中冷	卷 6，〈霍亂及嘔吐〉，頁 193b。
白散	散	療嘔吐酸水結氣築心	卷 6，〈霍亂及嘔吐〉，頁 194a。
茯苓湯	湯	療心頭結氣連胸背痛，及吐酸水日夜不止	卷 6，〈霍亂及嘔吐〉，頁 194a。
當歸鶴蝨散	散	心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197a。
檳榔鶴蝨散	散	諸蟲心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197b。

鶴蝨丸	丸	療蛔蟲心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198b-199a。
鶴蝨檳榔湯	湯	療蝎心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199a-b。
桔梗散	散	主冷氣心痛肋下鳴轉，喉中妨食不消，常生食氣。每食心頭住不下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199b。
當歸湯	湯	療惡疰撮肋連心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199b-200a。
雷丸鶴蝨散	散	療心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05a-b。
桃人丸	丸	療心痛，手足煩疼，食飲不入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06a。
桔梗散	散	療心腹中氣時痛，食冷物則不安穩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08a。
當歸湯	湯	療卒心腹痛，氣脹滿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08a-b。
鼈甲丸	丸	療鼓脹氣急，衝心硬痛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09b。
人參丸	丸	療患久心痛腹滿并痰飲不下食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0b。
柴胡厚朴湯	湯	療心腹脹滿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0b。
郁李人丸	丸	療心腹脹滿。腹中有宿水。連兩肋滿悶。氣急衝心坐不得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0b-211a。
紫蘇湯	湯	療患氣發心腹脹滿，兩肋氣急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1a。
必效青木香丸	丸	主氣滿腹脹不調。不消食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1b。
延年療患腹內氣脹雷鳴胸背痛方	湯	延年療患腹內氣脹雷鳴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2b。
檳榔湯	湯	療心頭冷硬，結痛下氣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3b。
檳榔丸	丸	療一切氣，妨悶不能食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3b-214a。

近效燒鹽通一切氣尤療風方	湯	通一切氣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4a。
半夏湯	湯	療胸脅不利。腹中脹。氣急妨悶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6a。
柴胡湯	湯	療胸膈滿塞。心背撮痛。走注氣悶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7a。
柴胡湯	湯	療胸膈間伏氣不下食。臍下滿	卷 7，〈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17a-b。
療心胸中痰積，氣噎嘔逆食不下方	湯	療心胸中痰積。氣噎嘔逆	卷 8，〈痰飲胃反噎　等〉，頁 226a。
療胸中痰飲。腹中水鳴食不消。嘔吐水。湯方	湯	療胸中痰飲。腹中水鳴食不消。嘔吐水	卷 8，〈痰飲胃反噎　等〉，頁 226b。
集驗療痰澼心腹痛兼冷方	散	療痰澼心腹痛	卷 8，〈痰飲胃反噎　等〉，頁 232b。
千金茯苓湯	湯	主胸膈痰滿	卷 8，〈痰飲胃反噎　等〉，頁 234b。
甘草飲子方	湯	療肺熱欬嗽。涕唾多粘	卷 8，〈咳嗽〉，頁 273b-274a。
葶藶子十五味丸	丸	飲氣嗽經久不已	卷 9，〈咳嗽〉，頁 276a。
紫菀湯	湯	療患肺脹氣急。欬嗽喘麤	卷 8，〈肺痿肺氣上氣咳嗽〉，頁 283b。
撩肺氣積聚。心肋下滿。急發即欬逆上氣方	湯	救急療肺氣積聚。心肋下滿	卷 8，〈肺痿肺氣上氣咳嗽〉，頁 284a-b。
必效療上氣方	湯	肺痿肺氣上氣咳嗽	卷 8，〈肺痿肺氣上氣咳嗽〉，頁 288b。
必效主上氣腹脹心胸滿。并欬不能食方	湯	主上氣腹脹心胸滿。并欬不能食	卷 8，〈肺痿肺氣上氣咳嗽〉，頁 296b-297a。
廣濟療腹中癖氣方	丸	療腹中癖氣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1a-b。
廣濟療痃氣方	丸	療痃氣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5a。
療兩肋脹急，痃滿不能食兼頭痛壯熱身體痛方	湯	痃滿不能食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5a-b。
療癥癖痃氣不能食兼虛羸瘦四時常服方	散	療癥癖痃氣不能食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5b。
療癖飲	丸	療癖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6a。

桃人丸	丸	主痃癖氣漫心脹滿不下食。發即更脹連乳滿。頭面閉悶欬氣急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6a-b。
檳榔子丸	丸	主腹內痃癖氣滿。胸背痛不能食。日漸羸瘦四肢無力。時時心驚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6b。
療痃癖，發即兩肋弦急滿不能食方	丸	痃癖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7a。
半夏湯	湯	主腹內左肋痃癖硬急氣滿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7a。
黃耆丸	丸	療風虛盜汗不能食。腹內有痃癖氣滿者方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27b。
療腹內積聚，癖氣衝心。肋急滿。時吐水不能食。兼惡寒方	丸	療腹內積聚。癖氣衝心。肋急滿。時吐水不能食。兼惡寒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33a。
白　丸	丸	主積聚癖氣不能食。心肋下滿。四肢骨節酸疼。盜汗不絕	卷 12，〈癖及痃氣積聚癥瘕胸痹奔豚〉，頁 333a。
桃奴湯	湯	主伏連鬼氣	卷 13，〈骨蒸傳屍鬼疰鬼魅〉，頁 359a-b。
初得遁尸鬼疰。心腹中刺痛不可忍方	湯	鬼疰	卷 13，〈骨蒸傳屍鬼疰鬼魅〉，頁 360a。
煮散方	散	中風	卷 14，〈中風〉，頁 376b。
附子湯	湯	療諸風	卷 14，〈中風〉，頁 396b-397a。
苦參十二味丸	丸	療風熱未退	卷 14，〈中風〉，頁 397a-b。
十九味丸	丸	療諸風	卷 14，〈中風〉，頁 398b。
犀角丸	丸	濟療心虛熱風上衝頭面	卷 15，〈風狂及諸風〉，頁 408b。
療頭面熱風，頭旋眼澹，項筋急強，心悶腰腳疼痛，上熱下冷健忘方	丸	療頭面熱風。頭旋眼澹。項筋急強。心悶腰腳疼痛。上熱下冷。健忘	卷 15，〈風狂及諸風〉，頁 419b。
檳榔湯	湯	療肝勞虛寒。脅下痛。脹滿氣急。眼　濁視不明	卷 16，〈虛勞〉，頁 432b-433a。
人參消食八味等散	散	療脾虛勞寒	卷 16，〈虛勞〉，頁 440b-441a。
療腹中冷氣，腰胯冷痛方	丸	療腹中冷氣，食不消，腰胯冷痛	卷 17，〈虛勞〉，頁 471b-472a。
療患腰腎虛冷，腳膝疼痛胸膈中風氣，重聽丸方	丸	療患腰腎虛冷。腳膝疼痛胸膈中風氣	卷 17，〈虛勞〉，頁 472a。

療下冷腰胯。肋下結氣刺痛方	丸	療下冷腰胯，肋下結氣刺痛	卷 17，〈虛勞〉，頁 472b。
必效療腰腎病膿水方	散	療腰腎病膿水	卷 17，〈虛勞〉，頁 473a。
檳榔飲子	湯	平脹	卷 18，〈腳氣〉，頁 493b。
延年茯苓飲	湯	主腳氣腫氣急上氣。心悶熱煩。嘔逆不下食	卷 18，〈腳氣〉，頁 506a-b。
療腳氣急上衝心悶欲死者方	湯	療腳氣急上衝心悶欲死	卷 18，〈腳氣〉，頁 507a-b。
療腳氣心煩悶，氣急臥不安方	湯	療腳氣心煩悶。氣急臥不安	卷 18，〈腳氣〉，頁 507b。
療腳氣攻心悶，腹脹氣急欲死者方	湯	療腳氣攻心悶。腹脹氣急欲死	卷 18，〈腳氣〉，頁 507b。
射干丸	丸	療腎虛風。腳氣衝心	卷 18，〈腳氣〉，頁 507b。
毒氣攻心欲死者方	湯	毒氣攻心欲死	卷 18，〈腳氣〉，頁 509a。
徐王用尋常氣滿方	湯	腳氣	卷 18，〈腳氣〉，頁 509a-b。
腳氣冷毒悶。心下堅。背膊痛。上氣欲死者方	湯	腳氣冷毒悶。心下堅。背膊痛。上氣欲死	卷 18，〈腳氣〉，頁 509b。
近效救腳氣衝心方		近效救腳氣衝心	卷 18，〈腳氣〉，頁 510a。
加減青木香丸	丸	療一切腳氣發	卷 18，〈腳氣〉，頁 510b。
療腳氣上衝心狂亂悶者方	丸	療腳氣上衝心狂亂悶	卷 18，〈腳氣〉，頁 510b。
療腳氣衝心，肺氣氣急及水氣臥不得立驗方	散	療腳氣衝心。肺氣氣急。及水氣臥不得	卷 18，〈腳氣〉，頁 510b-511a。
崔氏療腳氣遍身腫方	湯	療腳氣遍身腫	卷 19，〈腳氣〉，頁 515a-b。
療腳氣滿小便少者方	湯	療腳氣滿	卷 19，〈腳氣〉，頁 516a。
療腳氣，老人弱人脹滿者方	湯	療腳氣	卷 19，〈腳氣〉，頁 516a-b。
唐侍中療苦腳氣攻心方	湯	散腫氣	卷 19，〈腳氣〉，頁 517b。
腫滿小便少者方	湯	腫滿小便少	卷 19，〈腳氣〉，頁 518b。
紫蘇湯	湯	腳氣腫滿小便澀	卷 19，〈腳氣〉，頁 518b-519a。
檳榔湯	湯	療上氣	卷 19，〈腳氣〉，頁 519b。
蘇恭下氣消脹方	丸	腳氣定時候間滿腹脹不能食者。四時俱得服。下氣消脹方	卷 19，〈腳氣〉，頁 519b-520a。
蘇恭下氣消脹方	湯	腳氣	卷 19，〈腳氣〉，頁 520a。
蘇恭煮散	散	療腳氣	卷 19，〈腳氣〉，頁 523b-524a。
療諸腳氣弱。未至大發。尋常煮散方	散	療諸腳氣弱	卷 19，〈腳氣〉，頁 524a。

吳茱萸湯	湯	腳氣	卷 19，〈腳氣〉，頁 531a。
腳氣風毒發隨身藥	湯	腳氣風毒	卷 19，〈腳氣〉，頁 536a。
腳氣尋常氣滿湯方	湯	腳氣風毒	卷 19，〈腳氣〉，頁 536b。
大檳榔丸	丸	療水腫	卷 20，〈水病〉，頁 540a-b。
海蛤丸	丸	主下水氣	卷 20，〈水病〉，頁 558a。
含丸方	丸	癭病	卷 23，〈癭瘤咽喉癮瘿〉，頁 620b-621a。
五香丸	丸	主口臭及身臭	卷 23，〈癭瘤咽喉癮瘿〉，頁 643b。
廣濟療疝氣核腫疼方	丸	疝氣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11a。
狐陰丸	丸	疝氣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11a。
集驗貫眾丸	丸	療九蟲動作諸病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17b。
麥門冬五隔下氣丸	丸	療肺勞熱損。生肺蟲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18a-b。
廣濟療蛔蟲方	湯	療蛔蟲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19a。
肘後療白蟲方	湯	療白蟲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20b。
救急療白蟲方	湯	療白蟲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21a-b。
廣濟療蛔蟲寸白蟲方	湯	療蛔蟲寸白蟲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24a-b。
療寸白蟲化為水泄出永除方	散	療寸白蟲	卷 26，〈痔病陰病九蟲等〉，頁 724b。
金瘡炙瘡火燒瘡等方	膏藥	金瘡炙瘡火燒瘡	卷 29，〈墜墮金瘡等〉，頁 786a。
救急五香丸	丸	療諸毒痓氣	卷 31，〈採藥時節所出土地諸家丸散酒煎解諸毒等〉，頁 845b-846a。
青木香丸	丸	療一切氣腹脹滿。心痛氣冷。食不消	卷 31，〈採藥時節所出土地諸家丸散酒煎解諸毒等〉，頁 846a。
療一切病方	湯	療一切病	卷 31，〈採藥時節所出土地諸家丸散酒煎解諸毒等〉，頁 849a-b。
劉氏療小兒冷癖痃癖氣方	丸	療小兒冷癖痃癖氣。不下食瘦。時時肋下痛	卷 35，〈小兒諸疾〉，頁 990a。

劉氏療小兒肚脹四肢熱不調方	湯	療小兒肚脹。漸瘦不食。四肢熱不調	卷 35，〈小兒諸疾〉，頁 991a。
紫菀湯	湯	療肺脹氣急。呀嗽喘麤。眠臥不得。極重恐氣即絕	卷 38，〈小兒諸疾〉，頁 1059a。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丁紹儀，《東瀛識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據民國四十六年[1957]臺灣銀行出版之臺灣文獻叢刊重新勘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T.2089)，收入《遊方記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1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元稹撰，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日華子，《日華子本草》，收入尚志鈞輯釋，《日華子本草、蜀本草(合刊本)》，合肥：安徽科技技術出版社，2005。

王其禕、周曉薇編著，《隋代墓誌銘彙考》，北京：線裝書局，2007。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王棠，《燕在閣知新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4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燾，《外臺秘要》，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

未名，〈某僧乞請某大德賜藥草狀〉(S.5901)，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吳任臣編，《十國春秋》，收於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李白撰，安旗等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0。

李石著，謝成俠校勘，《司牧安驥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清光緒六年[1880]至八年[1882]金陵書局校刊本。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李珣，《海藥本草》，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沈佺期撰，連波、查洪德校注，《沈佺期詩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孟詵著，范鳳源訂正，《敦煌石室古本草》，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孟詵著，謝海州等輯校，《食療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據民國五十三年[1964]臺灣文獻叢刊第 202 種影印。
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法照，〈辰年正月十五日道場施物疏〉(北大 D162V)，收入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侯寧極，《藥譜》，收入陶穀，《清異錄》，上海：文明書局，1922，據寶顏堂秘笈本影印。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段公路，《北戶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
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T.2052)，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唐慎微撰，寇宗奭衍義，張存惠重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據北京圖書館藏宋版影印。
孫思邈，《千金翼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74。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徐松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標點校勘，王德毅校訂，《宋會要輯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四部叢刊本影印。
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張鷟著，恆鶴校點，《朝野僉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張鷟撰，李時人、詹緒左校注，《遊仙窟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曹鄴撰，梁超然、毛水清注，《曹鄴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收入鄭金生整理，《南宋珍稀本草三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陶弘景著，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陸游，《南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T.2125)，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4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賈思勰，《齊民要術》，北京：中華書局，1985。
道宣，《續高僧傳》(T.2060)，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甄權，《藥性論》，收入尚志鈞輯釋，《藥性論、藥性趨向分類論(合刊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劉恂著，商璧、潘博校補，《嶺表錄異校補》，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T.2053)，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慧琳，《一切經音義》(T.2128)，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4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樊綽著，向達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歐陽詢等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敦煌學研究會，1984。
盧綸撰，劉初棠校注，《盧綸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檀萃，《滇海虞衡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據問影樓輿地叢書本排印。
韓保昇，《蜀本草》，收入尚志鈞輯釋，《日華子本草、蜀本草(合刊本)》，合肥：安徽科技技術出版社，2005。
韓理洲輯校，《全隋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賾藏主，《古尊宿語錄》(X.1315)，收入《卍新纂續藏經》，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第 68 冊。
蘇敬，《新修本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蘇軾撰，施元之註，《施註蘇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蘇頌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釋惠洪，《禪林僧寶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釋道原，《景德傳燈錄》(T.2076)，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1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二、近人論著

下定雅弘，《柳宗元——逆境を生きぬいた美しき魂》，東京：勉誠出版，2009。
于志鵬，《宋前咏物詩發展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
于賡哲，〈唐代藥材產地與市場〉，收入于賡哲，《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山本信吉等，《醫心方の研究》，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4。

山田慶兒，《中国医学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東京都：岩波書店，1999。
中村元，《仏教植物散策》，東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1986。
中國航海學會、泉州市人民政府編，《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中國航海學會、泉州市人民政府編，《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卞孝萱，《元稹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0。
尹楚彬，〈曹鄴生平考辨〉，《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桂林，1990)，頁 28-33。
方國瑜，〈樊綽《雲南志》考說〉，《思想戰線》，1981：1(昆明，1981)，頁 1-6。
王四達，〈閩臺檳榔禮俗源流略考〉，《東南文化》，2(南京，1998)，頁 53-58。
王邦維，《唐高僧義淨生平及其著作論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
王冠中，〈魏晉南北朝外來文化輸入及其對時人生活的影響〉，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王家葵、張瑞賢、銀海，〈《新修本草》纂修人員考〉，《中華醫史雜志》，30：4(北京，2000)，頁 200-204。
王偉，〈唐宋藥名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
王偉琴，《敦煌變文作時作者考論》，西安：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博士論文，2009。
王慧芳，〈泉州灣出土宋代海船的進口藥物在中國藥學史上的價值〉，《海交史研究》，4(泉州，1982)，頁 60-65。
平岡武夫，《白居易——生涯と歲時記》，京都：朋友書店，1998。
田中謙二，〈薬名詩の系譜〉，收入藪內清、吉田光邦編，《明清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頁 205-229。
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2。
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何易展，〈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生平考述〉，《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成都，2006)，頁 36-40。
宋德熹，〈美麗與哀愁——唐代妓女的生活與文化〉，收入宋德熹，《唐史識小》，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 165-219。
杉山二郎，《鑑真》，東京：三彩社，1971。
杉立義一，《医心方の伝来》，京都：思文閣，1991。

李平，〈唐代醫家王燾考〉，《中華醫史雜志》，27：3(北京，1997)，頁 181-184。
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李純蛟，〈晚唐詩人曹鄴生平略考〉，《西華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6(南充，2003)，頁 37-39。
李國慶，〈雜字研究〉，《新世紀圖書館》，2012：9(南京，2012)，頁 61-66。
李清淵，〈李白贈衛尉張卿詩別考〉，《文學遺產》，1992：6(北京，1992)，頁 54-59。
李雲晉，〈南詔行政區劃及政區建置考述〉，《大理文化》，2008：5(昆明，2008)，頁 61-64。
沈文凡、楊海霞，〈唐代大歷詩人李嘉祐研究述評〉，《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9(永州，2006)，頁 25-28。
周明儀，〈從文化觀點看檳榔之今昔〉，《南華大學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5(嘉義，2008)，頁 111-137。
妹尾達彥，〈白居易と長安・洛陽〉，收入太田次男等編集，《白居易の文学と人生 I》，東京：勉誠社，1993，頁 270-296。
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迹——中華蔗糖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屈直敏，〈袁滋《雲南記》考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3(北京，2009)，頁 140-147。
屈直敏，《敦煌文獻與中古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岡西為人編著，《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南天書局，1977。
岩本篤志，《唐代の医薬書と敦煌文献》，東京：角川学藝出版，2015。
松本肇，《柳宗元研究》，東京：創文社，2000。
林明華，〈我國栽種檳榔非自明代始——對《中越關係史簡編》一則史實的訂正〉，《東南亞研究資料》，1986：3(廣州，1986)，頁 99-102。
林富士，〈試論影響食品安全的文化因素——以嚼食檳榔為例〉，《中國飲食文化》，10：1(臺北，2014)，頁 43-104。
林富士，〈瘟疫、社會恐慌與藥物流行〉，《文史知識》，2013：7(臺北，2013)，頁 5-12。
林富士，〈檳榔入華考〉，《歷史月刊》，186(臺北，2003)，頁 94-100。
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臺北，2017)，頁 463-464。

花房英樹、前川幸雄，《元稹研究》，京都：彙文堂書店，1977。
侯先棟，〈段公路《北戶錄》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3。
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姚崇新，〈中外醫藥文化交流視域下的西州藥材市場〉，收入姚崇新，《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395-420。
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皆川雅樹，《日本古代王権と唐物交易》，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
范新俊，〈敦煌「變文」中的藥名詩〉，《醫古文知識》，2004：3(上海，2004)，頁 19。
郁賢皓，〈再談李白詩中「衛尉張卿」和「玉真公主別館」——答李清淵同志質疑〉，《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1(南京，1994)，頁 101-106。
郁賢皓，〈李白詩中「衛尉張卿」續考〉，《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2(南京，1993)，頁 53-54。
郎瑞萍、葉會昌，〈大曆詩人李嘉佑貶謫期間的詩歌論略〉，《蘭臺世界》，2013：33(瀋陽，2013)，頁 80-81。
孫杰，《竹枝詞發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柴田承二監修，《圖說正倉院藥物》，東京：中央公論社，2000。
容媛，〈檳榔的歷史〉，《民俗》，43(廣州，1929)，頁 1-51。
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袁仁智、潘文主編，《敦煌醫藥文獻真迹釋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5。
郝潤華，《鑑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馬繼興，〈《食療本草》文獻學的研究〉，收入謝海州等輯，《食療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頁 158-170。
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日本醫史學雜誌》，31：3(東京，1985)，頁 325-371。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漢學研究》，4：2(臺北，1986)，頁 231-270。
張婷，〈《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4。
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曹興興、茹慧，〈中國古代檳榔的栽培技術及歷史地域分布研究〉，《農業考古》，2010：4(南昌，2010)，頁 193-197。

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郭聲波、劉興亮，〈中國檳榔種植與檳榔習俗文化的歷史地理探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4：4(西安，2009)，頁 5-15。
陳良秋、萬玲，〈我國引種檳榔時間及其他〉，《中國農村小康科技》，2007：2(北京，2007)，頁 48-50。
陳佳榮，《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
陳佳榮、謝方、陸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滙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964。
陳明，《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陳瑾淵，〈《續高僧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2。
陳穎、洪營東，〈王燾《外臺秘要方》探源〉，《四川中醫》，30：7(成都，2012)，頁 24-25。
陳鴻瑜，《緬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
鳥越泰義，《正倉院薬物の世界——日本の薬の源流を探る》，東京：平凡社，2005。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
朝比奈泰彥編修，《正倉院藥物》，大阪：植物文獻刊行會，1955。
森克己，《続々日宋貿易の研究》，東京：勉誠出版，2009。
黃錦珠，《白居易——平易曠達的社會詩人》，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
楊丁寧，〈唐大曆詩人李嘉祐生平交游的幾個問題〉，《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S1(北京，2011)，頁 63-66。
楊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楊廷福，《玄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
萬方、陶敏，〈王燾家世里籍生平新考〉，《山東中醫學院學報》，12：3(濟南，1988)，頁 40-44。
葛應欽，〈嚼食檳榔的文化源流〉，《健康世界》，162(臺北，1999)，頁 32-34。
鄒介正，〈《司牧安驥集》的學術成就和影響〉，《中國農史》，1992：3(南京，1992)，頁 116-119。
翟滿桂，《柳宗元永州事迹與詩文考論》，上海：三聯書店，2015。
蒲曾亮，〈李珣生平及其詞研究〉，湘潭：湘潭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5。
趙林濤，《盧綸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
趙紅菊，《南朝咏物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劉化重，〈《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新論〉，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8。

劉瑞明，〈《伍子胥變文》的藥名散文新校釋〉，《敦煌研究》，2016：4(蘭州，2016)，頁 70-73。

歐天發，〈藥名文學之原理及其形式之發展〉，《嘉南學報》，31(臺南，2005)，頁 493-513。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鄭有國，《中國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鄭有國，《福建市舶司與海洋貿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鄭志敏，《唐妓探微》，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儲仲君，〈李嘉祐詩疑年〉，《唐代文學研究》，1990(桂林，1990)，頁 134-170。

韓建立，〈《藝文類聚》編撰人員考辨〉，《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4(南京，2014)，頁 96-101。

韓建立，《《藝文類聚》纂修考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羅聯添編著，《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

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關周一，《中世の唐物と伝来技術》，東京：吉川弘文館，2015。

Anderson, Christian A. “Betel Nut Chewing Culture: The Social and Symbolic Life of an Indigenous Commodity in Taiwan and Hain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7.

Imbault-Huart, Camille. “Le Bétel.” *T’oung Pao* 5 (1894): 311-328.

Morarjee, Sumati. *Tambula: Tradition and Art*. Bombay: Morarjee, 1974.

Schafer, Edward H.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Schafer, Edward H.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Zumbroich, Thomas J.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Betel Chewing: A Synthesis of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eJournal of Indian Medicine* 1:3 (2008): 87-140.

Betel Nut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from the Sixth through the Tenth Centuries

Fu-shih Li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betel nut entered Chinese territory around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140-87 BCE), but not until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s (from the first century to the third century CE) did the Chinese gradually learn about the betel nut. In addition, Chewing or using betel nut remained a fashion only among the southern nobles toward the close of the Six Dynasties (third century to sixth centuries), after which the north-south separation came to an end as the unification of Sui-Tang Dynasties brought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power back to the nor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enabled betel nut to spread beyond the southern provinces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etel nut was produced and circulated mainly in Lingnan, Yunnan, Jiangsu, Zhejiang, Hunan, Chang'an, Luoyang and Dunhuang from the Sui-Tang Dynasties to the Five Dynasties. It was consumed as a chewed snack only in Lingnan, Yunnan, and Fujian; other places treated it as a medicinal drug. However, if not confined by material evidence,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that the cultural terrain that betel nut conquered in this period exceeded the previous one and its social impact was deeper. Contemporaries' knowledge of betel nut was clearly established. In parallel to inheriting and compounding what their predecessors had already known, they gained new understanding of betel nut's medical function with various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y also knew more about the foreign distribution of betel nut based on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first-hand knowledge, and literary references to betel nut were marked by diverse approaches to its representation and new imagery. Most of the authors or protagonists of betel nut literature came from the north. Only very few of them could be counted as southerners. As a result,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betel nut attained a wider spread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than in the previous periods.

Keywords: Sui-Tang Dynasties, Five Dynasties, betel nut, medicine, culture